

中國是怎麼形成的？



歷代中國本部與勢力範圍

杜正勝

中央研究院院士

古今論衡 第 39 期 2022.12

緣起

千禧年以來，中國崛起，無論經濟、政治、軍事方方面面，都在國際間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中國」是什麼？不但成為學界的一大課題，也為各階層、各行業的人所關注。歷史學的探索方法基本上是要沿波討源，尋根究柢，由表及裡，不但理清演變，還要揭發本質，這樣才可能概括其貌而入其精神。

上世紀末，我應日本秦漢史學會之邀，在他們的第 11 回（1999 年）年會上發表專題演講，^① 主要內容雖然集中在先秦古代，最後提出的「漢化假說」則涉及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國人？給自己開一張研究支票，作為日後研究的功課。

兩年前（2020 年），世界普遍覺醒應該重新認識中國，我主持當年政治大學「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系列演講，算是稍稍兌現二十多年前的自我承諾，也剛好回應近年來世人注目的問題。^②

「何謂中國」？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文化是什麼？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牽涉整部中國史。我直接的反應是沒有平面的答案，答案應存在於長期累積的過程中，所以是一個大歷史問題。然而「大歷史」非「速寫」，無以見其貌，亦難見其神，既不必抬出什麼大理論，也不要淪於虛玄，只就歷史學的基本入門，也是看家本領，追步其演變痕跡，看看古今的「中國」是怎麼形成的，應該就可以獲得一些比較可靠的答案。

俗話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我們只能大處著眼，即使百年也成了小單位，故謂之「大歷史」；而畫家的速寫以寥寥幾筆勾勒出形象面目和內在世界。這幅中國速寫從時間的演進和地域的延伸來了解中國過往總總的骨架，並考察她與異族、外國相處的基本態度。

一、萬年中國史三期論

考察中國的形成，要放在最近一萬年的時空架構，才好看出一些眉目。傳統史家說史多始於文字記載的時代，近代史學的要求卻需有當代記錄才算數，所以嚴謹的中國史學只能始於甲骨卜辭的殷代；其前的載記俱屬傳說時代，超乎人世情理的更早故事則劃入神話時代。

^① 杜正勝，〈中國古代社會多元性與一統化的激盪——特從政治與文化的交涉論〉，《新史學》11.2（2000）：1-39。又見勅山明譯，〈中國古代社會における多元性と統一化の激動—政治と文化の交渉から論ず—〉，《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1（2000）：4-75。

^② 系列演講的第一講「大歷史的中國速寫」（2020.10.29）相當概括，文稿有比較詳細的論述，在本刊單獨發表。

近代考古學興起，地層學建構時間序列，輔以器物類型學和稍晚才運用的碳 14 測年法，即使無文字記載，人類活動的時序仍然能夠建立起來，雖不如檔案紀年之精密，對於觀察社會文明發展的大歷史，已經足夠了。

我是屬於結合考古學和文獻史學的新學派，所以中國土地上的人群開始過定居生活，知道農作栽培的新石器時代，就算歷史了，距今約一萬年前，不只是傳統的四千或五千年而已。這種研究路徑源自澳洲出生的歐洲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V. Gordon Childe），他那著名的從「新石器革命」（The Neolithic Revolution）進入「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理論，清晰指出人類早期歷史發展的圖像。^③

不論東方或西方，歷史記錄長期都有紀年（chronology）的傳統，以朝代帝王繫年。這種流水帳殊難建立時代觀念，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祖述希臘羅馬，貶抑他們承接的中古「黑暗」千年，史家乃創古代（Ancient）、中古（Middle Ages）和近代（Modern）的三段法。據考，三段法始自雷歐納多·布魯尼（Leonardo Bruni）之《佛羅倫斯人民史》（*Historiae Florentini Populi*, c.1442），弗拉菲歐·比歐恩多（Flavio Biondo）再追溯到羅馬帝國（*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norum imperii, Decades of History from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1484）。^④ 晚近史家遂多承襲此三期法，或把近代再一分為二而成四期。

三段或四段劃分法，都只限於所謂有文字記載的時期，運用到中國歷史上，此理論之引介提倡首推雷海宗，但他獨特地依此模式又分前後兩周期，每一周期都經歷了封建—貴族—帝國的三段模式，^⑤ 中國史領域內，固不乏持三或四段的模糊概念，但實踐者甚少，倒是宮崎市定晚年出版的《中國史》做了具體的示範，展現他在世界史範圍內的宏觀通識。^⑥

斷代分期的條件，在於能把握一個時段的共象以區別於其他時期，雷海宗所謂的「封建的」、「貴族的」和「帝國的」，即是他標識該時段的「文化形態」。文化形態史觀雖然不標榜唯物主義，但標識時代特色的作法顯然帶有歷史唯物論的痕跡。歷史唯物論起源於十九世紀中期卡爾·馬克思社會形態說，經過列寧改造，至斯大林總結為原始氏族—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五個時期，又稱作「歷史五段論」。

歷史五段論植基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下層結構決定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也就是上層結構，從原來的社會形態說衍變成歷史階段論後，其僵化矛盾已經不言而喻。但共產中國統治的前三十年，五段論則成爲中國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的金科玉律，遍

③ 參 V. Gordon Childe, *Man Makes Himself* (1936) (Bradford-on-Avon: Moonraker Press, First illustrated edition, 1981), pp. 68-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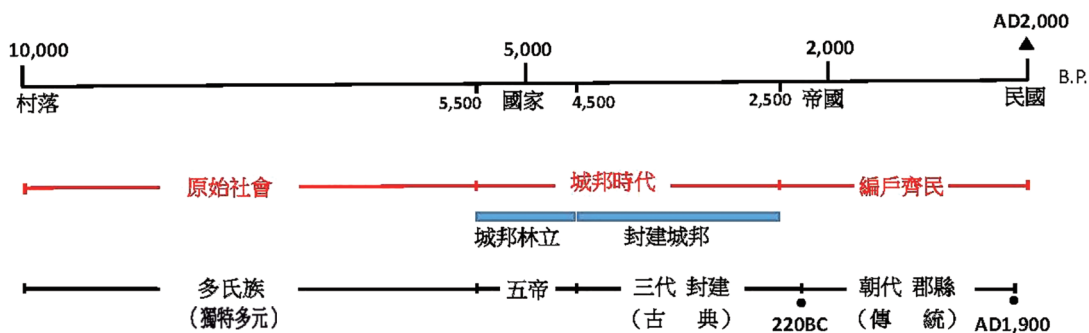
④ 引自 Jeremy Norman's Historyofinformation.com, "Origins of the Three-Period Framework of History".

⑤ 雷海宗，〈中國文化的兩周〉及〈歷史的形態與例證〉，收入雷海宗、林同濟，《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外一種）》（長沙：岳麓書社，1989 重印），頁 131-164, 201-220。

⑥ 宮崎市定著，邱添生譯，《中國史》（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

及各個領域，學術討論限於這階段架構內，只容許具體時代劃分點的差別而已。所謂的歷史分期論辯，不論古代史分期或近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都離不開歷史五段論的規範。上世紀八〇年代改革開放後，五段論雖然不再是主宰史學研究的教條，其概念在中國仍無可取代；至於涉及塑造國民意識的教學領域，僵化的教條依附政權，其實很難改變。

歷史五段論是一種非歷史、也非社會的史觀，然其時間涵蓋史前，標識各社會階段特徵，形式上，這兩點符合我說的歷史分期要件，亦不無可取。中國大歷史的建構應具備這兩個方面，但我們的內涵當然可能截然不同。茲列出我所擬的一萬年中國歷史分期表如下（圖一）：



圖一：一萬年中國史表（作者繪製）

一萬年的中國史可以分作三大段落，「原始社會」約占前面的一半，後半由「城邦時代」和「編戶齊民」平分，前個轉型期可有五百年之久，後面的轉型期大約也有三百年左右。

講歷史而包括史前，事實上是史語所的學風，而一萬年年表始自新石器時代原始社會也顯然受到柴爾德的影響。事實上當今人類的文化與文明創造，有了農作和定居才邁步前進，中國也不例外，所以多年前我撰寫〈從村落到國家〉作為中國文化的根源。^⑦

這段一般稱作原始社會的時代，拜考古學發展之賜，提供可以信賴的史料，填補歷史的空白，不再如傳統史學只能以神話、傳說代替歷史。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研究最大的貢獻之一，所以中國史可以上溯到一萬年前，不只傳統的四、五千年而已。

第一段原始社會延續約五千年，在今日中國疆域內，北起遼河燕山，南至長江中下游，都出現各具特色的文化，可以劃分出不同區系，既有各自的時代傳承，也互

^⑦ 杜正勝，〈華路藍縷——從村落到國家〉，邢義田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永恆的巨流》（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頁 21-72。

相影響，有如考古學家蘇秉琦所說的「滿天星斗」，晚期而形成「古國、古城、古文明」。⁸ 林立的城邦於是出現，故知中國文明之始是多元的。

第二段城邦時代大約相當於傳統史學的五帝和三代。城邦是一種國家形態，以築有城牆的大型聚落（「國」）為國家的主體，連同城外的農莊（「野」）而構成一個「邦」，故謂「城邦」。

城邦是獨立的政治體，衆多城邦存在大小之分，其中最強大的共主對衆邦並沒有絕對權威，不過主持聯盟而已。邦內的國君也只是諸多氏族之首，共享統治權力。城內庶衆（「國人」）是城邦軍隊的成員，仍延續原始社會以來的氏族組織，對統治貴族還能發揮一點制衡作用，但其政治權威不足與古希臘城邦的公民大會（Assembly, *ekklesia*）和公眾法庭（Popular court, *heliaea*）相比擬。至於城外的「野人」更不具「國人」的政治實力，身分也較低，然而並不是奴隸。

到歷史上的春秋時代，共主式微，不同集團的城邦同盟互相攻伐，戰爭頻繁，各城邦紛紛起用野人當兵，「國」「野」的身分差異逐漸泯除，進入「編戶齊民」的時代。

編戶齊民雖然標識一種社會構成，亦體現一種國家形態，即中央集權的帝國。編戶者，全國人民編錄於戶籍，齊民是指在國家最高權威之前，人人身分齊等。廣大的齊民作為國家的基礎，支撐層層的統治階級。嬴秦完成統一帝國後，中國大地只有一個國家，只有一個絕對權威的皇帝，透過一個中央政府和二或三級地方政府而統治廣土衆民。帝國治下的齊民耕田納糧，提供政府無償勞動，並且服兵役以保衛政權。農戰便成為政權存在的兩個絕對要件，這種國家形態歷經秦漢以下無數朝代，基本上延續到今天。

萬年中國史三段論——原始社會、城邦時代和編戶齊民，應能體現中國政治形態與社會構成的特徵，也可以當作中國歷史的骨幹。每個段落長達數千年，當中固然有變化，本質並沒有改變。此一斷代分期法也適用於文化思想層面，譬如歷史時期的「城邦」和「齊民」這兩段，也可稱作「古典期」和「傳統期」。

斷代分期不但概括歷史內涵，直指歷史本質，也會體現史家的關懷和史觀。我的中國史三段分期既不同於西史模式的古代、中古、近代三段說，更與唯物主義的歷史五段論不同；在歷史時期倒與傳統史觀的「封建」、「郡縣」不謀而合，但關懷則異。

傳統史學關於大歷史演變的論述，首推唐朝柳宗元的〈封建論〉⁹ 最為深刻。柳宗元認為人類有政治體之後，由小而大，從下而上，形成「封建」的結構，諸大小政治體皆具其獨立自主性，這不是哪個聖王的創制，反而是歷史時勢造成的，概括成一

⁸ 參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

⁹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收入《四庫善本叢書初編·集部》，臺北：四庫善本叢書館，1959），卷三，頁1-8。

句話：「非聖人意也，勢也」。他所述的大小政治體即城邦，是歷史的自然產物，這點最具史識。

不過傳統史學對於「封建」和「郡縣」的討論，合不合乎歷史發展倒不在意，更關心的是現實政策與文化象徵。雖然秦始皇經群臣討論後，確定推行郡縣，封建邦國一去不返；但在後人心目中，「封建」代表令人嚮往的周政，「郡縣」則是暴秦的象徵，所以歷代不斷有恢復封建的籌議。柳宗元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和唐中葉藩鎮擅權的現實中，抒發史觀和政見，論說周代亂多治少，「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秦雖土崩瓦解，「失在於政，不在於制」。關於國家政體的建制，他絕對肯定郡縣制。

柳宗元深刻地指出當權統治者的心態，認為不論封建或郡縣，「其情私也」。他說：

（三代聖王不能廢諸侯），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

封建制存有周王私心，讓諸侯城邦服務於自己，以保衛周之子孫；郡縣制帝王的私心則是皇帝要建立最高權威，眾臣工都是他畜養的奴僕。中國政治的本質，柳子厚幾句話就一覽無遺，不愧是千古名論。

然而我的「城邦說」和「齊民論」則有不同的關懷。我成長於一人一黨集權且戒嚴的時代，目睹耳聞，對應史籍，有感於中國歷史發展政治力量獨大，社會力量萎縮，致使一人獨裁的中央集權制牢不可破。然而獨獨發現古代竟有過相對獨立自主的邦國，城內近似自由民的「國人」也能參與政治，與城邦沒落後的兩千年截然不同。那時代小國有權存在，¹⁰ 統治階級權力共享，尚無絕對王權；部分國人甚至能發揮左右政局的作用。這些現象進入編戶齊民時代完全成爲絕響，「齊民論」著力於帝國基石的庶衆，發現他們只有對政府盡義務的份，不可能向國家要求權利。自秦漢以下的帝制中，編戶齊民的特質基本沒有變過，應是帝制國家形態最醒目而持久的標識。

二、中國本部的形成

近二、三十年來，什麼是中國或中國人，成爲學界和一般社會關切的問題，要了解「中國」這個政治體的指涉，當然要先確定其範圍，才能說到人、事、物和歷史；然而放在這個一向自負歷史悠久且未中斷的國家，它的範圍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答的。

對身處臺灣的我們來說，經常會被北京一句話所困擾（騷擾），即「臺灣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十足的政治口號，既不符合歷史，也非實事求是的態度，

¹⁰ 《論語·季氏篇》記孔子反對季氏攻打附庸國顛臾，〈堯曰篇〉又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的論述，此一孔門理想的政治主張，當有城邦的歷史背景做根據。

史料反而呈現如雍正皇帝所說：「臺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皇考（康熙帝）聖略神威，取入版圖」，¹¹才算正確。可見探討「中國」的範圍不只是單純的歷史，也是現實的政治課題，困擾許多中國學者，立論難免都會反映其政治立場，但我們回歸學術才有真知識。

近代中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在一九七〇年代完成《中國歷史地圖集》，首要課題是如何畫定歷代中國的範圍，一九八一年在一個學術座談會上，他講述編撰地圖集的態度。¹²他認為「現代中國人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範圍」，就歷史學家關注現實而言，此一態度雖不符合歷史，但還可以理解。他又說：「我們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範圍來限定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範圍」，便不可理解。歷代不同時期的中國人所認為的「中國」範圍不能當作他們那個時代的中國，難道我們今天的認定會更接近當時中國的真實領域嗎？譚氏不取今日中國範圍作歷史的中國，而以「十八世紀五〇年代到十九世紀四〇年代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版圖作為歷史時期的中國範圍」，其實是採五千年來中國政權最廣大的疆域作基盤，來安排歷代與中原王朝有不同程度交涉的民族與國家，都當作歷史上的「中國」，固然可保政治正確，難道符合歷史真實嗎？基於此一前提，他認為歷代中原王朝不等於當代的「中國」，故王朝疆域不是當時中國的範圍，那麼歷史上真正的「中國」在哪裡？存在於清乾隆到道光之間的那個最大範圍的「中國」嗎？

我的研究態度則不同，應該還原不同時期「中國」的真面目。此一態度或許也可算是另一種政治立場，但至少回歸歷史學的求真原則。依此原則，任何論爭都屬於學術考辨的技術性問題而已，不關乎現實政治。

先從地理觀察當今的中國。中國坐落在歐亞大陸的東南隅，背對難越的高原、沙漠和草原，面向浩瀚阻絕的海洋。就方位而言，中國所在之地隔絕而孤立，並不是人類主要歷史舞臺——歐亞大陸眾多國家的中心。但這事實，中國漫長的歷史中，除佛教盛行時期外，並不為廣大的中國人所接受，且舉一則生動的記述來說明。

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沙守信（Émerric de Chavagnac, 1670-1717）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從江西撫州府（今撫州市）寄信給該會在法國的郭弼恩神父（Charles Le Gobien, 1652-1708），¹³提到他向中國人展示地球儀的故事。有九到十位文人要看他的地球儀，他們在上面找中國，找了老半天。最後他們認為包含歐洲、非洲和亞洲的

¹¹ 劉良璧編，《重修福建臺灣府志》（1741）（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74種，臺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重印，1995），卷首〈聖謨〉，「諭從優議敘平臺官員」（雍正元年）。其他相似史料所在多有，參看杜正勝，《臺灣心·臺灣魂》（高雄：河畔出版社，1998），「清人認為臺灣自古不隸中國」，頁181-185。

¹² 譚其驤，〈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1：37-45，收入《譚其驤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第一卷，〈代序一〉。

¹³ [法] 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I，頁242。原編 Jean-Baptiste Du Halde ed.,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Mémoires de la Chine* (à Lyon: J. Vernarel, 1819)。

那個半球是他們的國家，他們甚至覺得把世界其他部分歸於美洲似乎還大了一點。沙守信故意不作聲，任由他們講，直到其中一人要他解釋上面標明的文字和地名時，他才說：「你們看到的是歐洲、非洲和亞洲。在亞洲，這是波斯，這是印度，這是韃靼地區。」「那麼中國在哪裡呢？」他們都喊了起來。我回答道：

就在這塊陸地的角落裡面，這就是它的邊界。

我難以表達當時他們是多麼驚訝，面面相覷，自言自語地吐出幾個字：「小得很。」

在角落的中國，由於地球板塊碰撞，今日中國境內的地質造成三個階梯，按其海拔高度，依次是青藏高原第一階，蒙古、黃土和雲貴高原第二階，大興安嶺、太行山和雪峰山脈震旦走向這一線以東的平原丘陵地帶第三階。這三個階梯與高寒、乾旱、季風三個氣候區有相當程度的吻合。¹⁴

氣候和地形影響人類行為甚巨，一萬年中國歷史舞臺主要是在扣除東北的第三階梯，加上第二階梯的中部，黃河到長江之間。此外的高原和草原都不是中國人活動的地域，只有少數幾條孔道通往中亞、西亞或更遠的歐洲，長年以來他們就在歐亞大陸這個相對封閉的區塊自稱「中國」（圖二）。



圖二：中國偏在歐亞大陸東南方

引自：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ternational Atlas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68)

（一）原中國

新石器時代，中國疆域內多種文化並存，考古學家蘇秉琦比之為「滿天星斗」，進而發展成眾多古國、古文化之說。¹⁵這也就是城邦林立的局面，此時當然不會產生

¹⁴ 星球研究所，〈中國從哪裡來？〉，引自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0729274586645299&wfr=spider&for=pc> (2022.10.04 檢索)。

¹⁵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

「中國」的觀念。傳說的共主黃帝雖「邑于涿鹿之阿」，但「遷徙往來無常處」；（《史記·五帝本紀》）聖王堯舜每年按四季分別到四方去會諸侯，古書稱作「巡守」。（《尚書·堯典》）司馬遷整理夏商兩朝歷史，其君王亦因不同原因而多次遷徙，凡此種種尚難有「中國」的概念，亦不可能有其現實；恐怕到商王盤庚遷殷以後，273年不再遷，才可能逐漸出現「中國」。

「中國」這個名詞的出現，今知最早者當數西周開國之初的銅器銘文〈何尊〉，只指都城，並不具備政治疆域的意涵。（下詳）即使如此，後世意義的「中國」則逐漸在形成，這個階段可以稱作「原中國」（Proto-China），司馬遷三代都城總匯之處應是最妥當的註解。

《史記·貨殖列傳》曰：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黃河沿河套而東，至陝西、山西兩省交界轉而往南，至潼關又折東而流，山西西南部黃河曲折之區曰河東，河水東流，其南曰河南。古黃河東過滎陽縣轉往東北，過濬縣再往北，這一線以西地區曰河內。傳說堯都平陽，即《詩經》之唐國，舜都蒲阪，禹都安邑，¹⁶都在河東。殷都所在的安陽，即古之河內，而周都的成周洛陽在古之河南。綜合整理五帝三代歷史的司馬遷說，山陝黃河拐彎入豫西的「三河」，自堯舜以來皆是王者之都，居天下之中心，是天下衆多城邦的「中國」，可以稱作「原中國」。

這是中國城邦時代，三河分別作為帝王之都，與其他衆都構成當時「中國」的全部，範圍見於〈禹貢〉。〈禹貢〉雖然托之於城邦時代早期的夏禹，其實是城邦晚期的著作，劃分天下為九州。由於九州有些州名後世作為省分的簡稱，古今地名相雜，範圍認定遂產生混淆，其實漢代孔安國作註，各州範圍大抵多有確指。《孔氏傳》曰：

兗州，東南據濟水、西北距河（黃河最早故道）；

青州，東北據海（渤海），西南距岱；

徐州，東至海（黃海），北至岱，南及淮；

揚州，北據淮，南距海（東海）；

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

豫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

梁州，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

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

¹⁶ 堯都，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帝王紀》：「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舜都，同上《集解》引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禹都，《史記·夏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禹「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

只有九州之首的冀州未明指界域，孔安國解釋說：「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從文本推，此州起於壺口，過河東的呂梁山和狐岐山，至河內的清漳、濁漳，雖然最後有「夾右碣石入于海」，但只及於太行山以東，不包括太行之西（即今山西）的部分。

考諸注疏，〈禹貢〉九州的四至，北邊冀州不含山西中北部及河北北部，雍州不含陝北黃土高原。東邊止於渤海、黃海和東海北端。南邊模糊，揚州的三江難確指，彭蠡在長江北岸，震澤是太湖；荊州的雲夢跨長江南北，最南只及於衡陽。西邊止於梁、雍二州的兩條黑水（異河同名），其地難定，參照文本所敘山川，大概從漢代蜀郡青衣縣以北過武都至隴西、金城，未超過青藏高原前沿地帶。〈禹貢〉四至之內可以算作「原中國」的最大範圍。

中國考古學界有一個比較爭議性的課題——商文化過不過長江？現在的考古證據是肯定的，但如果以青銅禮樂器作為中原統治階級文物的指標，即使製法、品類和文飾具有當地特色，比較大宗的出土，江西是新淦大洋洲，湖南集中在寧鄉，皆位於長江以南不太遠的地方。¹⁷湖南其他地區出土殷代銅器，如華容、石門、岳陽、長沙等地，亦在長江邊，到西周，最南也只到湘江中游的湘潭、湘鄉和衡陽而已，¹⁸不超出〈禹貢〉荊州南界衡山之陽。生活在黃河流域的〈禹貢〉作者，勾畫的「原中國」南界，可以得到今日考古證實，他傳述的四至應該是春秋以前「中國」的範圍。

（二）華夏集團與華夏意識

五千多年前從遼河流域的紅山，到錢塘江口的良渚，先後紛紛出現許多古城—古國—古文化，開啓中國歷史的城邦時代，而最早的夏商兩王朝，即是在潼關之東這片「東土」上，作為衆多城邦的共主。第三個王朝周則來自潼關之西，故自稱「西土之人」。

周族本是陝北黃土高原涇水中游的戎狄，發跡後製造族譜，把始祖稷說成是商始祖契的大哥，其實他們的歷史要到太王遷居渭水中游岐山下的周原才比較清楚。經過祖孫三代的經營，打跑被稱作混夷的原住民，（《大雅·緜》）吸收歸順者，壯大勢力範圍，到第四代武王就出關，擊潰當時的共主商王紂而成爲東土舊邦的新共主。¹⁹

在東土古國心目中，周人是外來的征服者，周族也心知肚明，統治階級一方面謙稱自己「小邦周」，訓誡族人要有憂患意識，提防再被革命；另一方面則向東土要衝之地殖民，派出自己的血親和姻戚，建立城邦聯盟。

¹⁷ 參彭適凡，《江西先秦考古》（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向桃初主編，《寧鄉青銅器》（長沙：岳麓書社，2014）。

¹⁸ 高至喜，〈「商文化不過長江」辨——從考古發現看湖南的商文化〉，及於〈論湖南出土的西周銅器〉，皆見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銅器》（長沙：岳麓書社，2007）。

¹⁹ 杜正勝，〈關於先周歷史的新認識〉，《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6（1991）：1-45。

周人東進是既艱困又血腥的過程，黃土高原來的戰士殺得「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豳風·破斧》）他們長年征戰，日夜思鄉，於是悲嘆「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豳風·東山》）這是一個別離哀怨的時代，武壯的丈夫「為王前驅」，留守家園的婦人，「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願言思伯，甘心首疾」；「願言思伯，使我心痠。」（《衛風·伯兮》）

被征服東土之人怎樣看待這個新變局呢？《小雅·大東》道盡他們的不滿與憤懣。東土人耕種的糧食被刮搜，盛滿西土人的大碗；東土人紡織機空無布帛，原來都落在西土公子的身上。東土人勞役不息，不可能得一官半職，西土人不論是周王子弟、一般人民或是家奴都佔滿官府的位置。他們十足像似天上銀河兩邊的牛郎星和織女星，織女織不出布，牛郎駕不了車。他們就像南邊的箕星，不能當簸箕吹揚穀物，也像北斗星，不會酌引酒漿；簸箕只吐長舌頭，北斗伸出勺柄，專來吞噬、撈取我們的資源。

四十幾年前，我研究周人封建殖民，提出鉗剪式征服的觀點，成周（洛陽）作為東進大本營，衛（淇縣）是東進補給站，齊（臨淄）魯（曲阜）則成為鉗剪的雙刃。這把大剪刀籠罩東土主要地區，延伸到整個今天山東半島，當時稱作「大東」，而魯西豫東地帶，魯衛之間，稱作「小東」。²⁰

東土城邦，不是被征服而亡國，就依附新共主當附庸，幸運的成為征服者的同盟友邦，如因周人政治需要而扶植的陳、杞、宋，他們是虞、夏、商之後代，可以當作政治宣傳的樣版；至於死硬派的抗拒者，自然成為周的敵人，被貶斥為夷狄。周王朝透過朝覲會同聯結友邦，建立一套政治秩序和統治文化，凝聚我群意識。他們這群城邦主大概自認或互稱「華夏」，²¹於是構成華夏集團，產生「華夏意識」。華夏的意涵難考，可能與第一個世襲王朝夏朝有關，至於唐代經典注疏家孔穎達所說，「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稱華」，（《左傳》定公十年疏）恐怕是望文生義的詮釋吧。

華夏集團對於不加入同盟、不遵守周王秩序、不行周禮的敵人，不是稱作戎狄，就是認為蠻夷。這些敵對的戎、狄、蠻、夷，不一定遠在集團四境之外，反而與華夏諸邦相雜廁。原來他們多是歷史悠久的古國，譬如晉建國時與戎狄為鄰，（《左傳》昭公十五年）但唐叔所封之地卻是夏墟，他採行的治理手段是「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左傳》定公四年）治下的族裔其實是自夏代以來的古國。《史記·齊世家》說齊之建國，太公欲都營丘，「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齊地的萊夷是古國，春秋齊國大賢晏嬰講說的履歷更清楚：從少皞時代的爽鳩氏始居此地，經夏代的季

²⁰ 杜正勝，〈周代封建的建立：封建與宗法（上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0.3（1979）：485-550；傅斯年，〈大東小東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1930）：101-109。

²¹ 《左傳》閔公元年，管仲對齊桓公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又襄公四年，山戎國君無終子派遣使臣赴晉，賄賂魏絳虎豹之皮，請和，晉君不許，絳曰：「諸侯新服，陳離楚陣營來附，如果「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即晉的同盟國。又襄公二十六年，宋向戌論楚材晉用，舉析公奔晉之例，致使繞角之役，晉轉敗而勝楚，他說：「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這個華夏即指中原諸邦。

前，商代的有逢伯陵，至殷周之際的蒲姑氏，周初武王封給太公望，其實是讓他們集團的姻親來征服殖民。（《左傳》昭公二十年）魯國鄰近也有淮夷、徐戎，《尚書》還保留一篇伯禽出征前的誓師文誥〈費誓〉。淮、徐是地域，不是國名，也不是族名，包含很多城邦。《左傳》提到今山東西部，魯國周邊的古國任、宿、須句、顓臾，風姓，都是太皞的後代，（僖公二十一年）比齊的爽鳩氏還古老，但新舊史料都說風姓是夷人。²²

從晉、齊、魯的立國史，可見華夏與夷狄的區分，主要繫於有沒有參加當權派的會盟集團，南方的楚即是明顯的例證。且不說屈原自述「帝高陽之苗裔」，《離騷》也不說周王廷史官史伯舉證的祝融之後，《國語·鄭語》單看《楚辭》的文字造詣和考古所見的藝術成就，楚人怎麼樣也不算是文化低落的野蠻人，然而長期以來被黃河流域的華夏集團蠻夷視之。西周王朝開始式微時，楚君熊渠很霸氣地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史記·楚世家》宣告不奉行華夏集團那套統治禮儀。

周王室強盛時，周王制定政治秩序，揭示文化規範，他領導的同盟集團固然遵奉，也用來衡量不屬集團的邦國，孔子稱這是「天下有道」的時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周王既控制軍事與政治，也掌管文化和倫理，其實禮樂建立在征伐之上，有軍政實力的人提倡的文化倫理就是「禮」與「理」，沒有實力則免談，這叫做「王道」。但西周覆亡，周室東遷，周王不再具備實力，「天下無道」了，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同上）精確地說應是自最強大的諸侯，所謂「霸主」者出，這時的軍政文化叫做「霸道」。春秋時代維持天下秩序和文化倫理的盟主，齊晉先後各領風騷，伐戎抗楚，扶助衰弱的華夏城邦。不過這時霸主國家只能在軍政發揮作用，周王朝的文化象徵只有從周王近親的魯衛尋找。文化既然寄生於政治，實力居二三流的魯衛所傳承的文化遂亦淪為古董，華夏集團意識自然產生轉變，「中國意識」於焉誕生。

（三）中國意識的形成

「中國」一詞春秋以前文獻罕見，即使出現並不具備如〈禹貢〉九州之意義；（下文將討論）九州意涵的「中國」倒可以從春秋的「華夏」找到源頭。換言之，春秋的「華夏」，進入戰國就多改稱「中國」了。

作為華夏集團的「中國」，最早見於《左傳》，西元前五八四年，吳伐郟，郟求和，魯國執政季文子慨嘆道：

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成公七年）

²² 新出晉侯蘇編鐘，銘文記述周厲王三十三年親征東國，令晉侯蘇伐夙夷，「夙」通「宿」。參馬承源，〈晉侯蘇編鐘〉，《上海博物館集刊》7（1996）。《古本竹書紀年》云：夏朝的相征風夷，后泄冊命風夷。

華夏集團衰落，致使南方新興的吳國入侵集團之一的郟國而無力協助。季文子不稱「華夏」而曰中國，不一定是實錄，不過此時已進入春秋後期，亦不無可能。

當時周的鄰近地區存在許多戎狄，周王使詹桓伯責備霸主晉國曰：「戎有中國，誰之咎？」（昭公九年）周王室大臣用了「中國」一詞。《左傳》還有一則，年代卻比較早，西元前六三五年，晉文公圍陽樊，當地人蒼葛抗議說：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
（僖公二十五年）

陽樊貴族不是周王的血親就是姻戚，自然屬於華夏集團。但這事件《國語·晉語四》同樣記載，亦曰陽人「皆王之父兄甥舅」，卻沒有「中國」「四夷」之對比，不能不令人懷疑《左傳》非實錄。春秋前期應該尚未出現與四夷對稱的「中國」，至於更早三十多年，《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莊公三十一年）《左傳》評論說：「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此乃左丘明的評論，已晚到春秋戰國之際，「中國」即華夏；稍晚，魯國縣子說：「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亦同指華夏集團。²⁵

春秋晚期指標性的人物孔子，其言行記錄最可信的《論語》未見「中國」，但也未見「華夏」。不過，西元前五〇〇年的夾谷之會，《左傳》記載他指斥齊景公「使萊人以兵劫魯侯」的陰謀曰：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定公十年）

以「華夏」對夷狄，而不說「中國」。《論語·八佾篇》記孔子說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說「諸夏」，不說「中國」。倒是《穀梁傳》詮釋《春秋》桓公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引述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鼎是郟國之鼎，魯從宋國取得，此「中國」乃指華夏集團的宋，即使此言為真，已經接近戰國時代，「中國」的用法逐漸普遍化了。

三傳解經，《左傳》透過記事顯現孔子《春秋》的用意，故可能引用當代史料，《公》《穀》二傳則詮釋微言大義為主，像老師教學生，遂多戰國時代的語彙。經文都是春秋的人與事，但《公羊》、《穀梁》沒有「華夏」，反而改用「中國」。

《公羊傳》出現的「中國」不勝枚舉，不但指中原華夏集團的地域，也有相對於戎狄的民族意涵，最有名的例證莫過於贊美齊桓公召陵之盟，迫使楚國屈服，不敢北進。《公羊傳》曰：

²⁵ 《禮記·檀弓上篇》，齊陳莊子死，訃聞於魯，繆公問該不該哭弔？縣子說：「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早先大夫未專權，交往不出其境，都在各邦的境內，雖欲哭弔亦不可得；現在君弱臣強，大夫專盟，多與他國往來，其交政的「中國」即是華夏諸邦的總稱。縣子指出陳莊子既然與魯多有交通，繆公焉能不去哭弔。

(楚)，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服也）荊。（僖公四年）

中國即是華夏集團。此前兩年，《春秋》曰：「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解釋：江、黃是遠國之辭，中國獨言齊、宋。按，江、黃皆嬴姓，屬今河南正陽縣、潢川縣，在淮水之南，大別山之北，²⁴公羊家認為遠離中原，即使參加華夏集團的盟會，仍不能算是「中國」，可見「中國」的空間範圍仍然限於黃河流域。

《公羊》的「中國」詞例，如「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中國指宋國，（僖公二十一年）為「中國諱」則指鄭國，（襄公二年）或指晉領導下的諸侯，（襄公八年）而「不與夷狄之主中國」的中國，（昭公二十三年）是指位於今河南的蔡、陳、許和頓、胡、沈等三、四流小國，都屬於黃河流域的華夏集團。凡此都要從整體記事去理解，不能把「中國」二字孤立地解讀。

意涵華夏集團之「中國」一詞，春秋末年的孔子是否說過，尚難確證，不過戰國中期的孟軻卻很明確。農家許行自楚之滕，說服滕君實行他的君民並耕論。自宋赴滕的陳相聽聞許行學說，乃背棄其師陳良，改投許行門下。當時在滕國的孟軻指責陳相說：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孟子·滕文公篇》）

相對於楚之為夷，北方學者就是夏，也是「中國」。孟軻的「中國」意涵，地理在北方（黃河流域），族類是華夏，文化則是周公制定、孔子講述的政治社會規範，也就是經典所代表的周文化。

許行之不被孟軻認可為「中國人」，除了是楚國出生，還因為他主張君民並耕而食，致使國君無暇於「教以人倫」，不用心於「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會淪為夷人之道。地理、民族和文化三合一，才符合華夏集團的條件，到戰國中期，所在地的北方不再是必要的了，如陳良是楚人，但奉行周道，在孟子心目中便不再是夷人，反而可以算作「中國人」。另外一個例子也可以證明我們的論斷，雖然故事情境完全相反。

《孟子·告子篇》記載孟軻和白圭財稅主張的論辯。孟軻為滕規劃「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滕文公篇》）主張什一之稅；白圭在魏則「欲二十而取一」。減稅一半，應該是體恤人民，儒家理該贊同，但卻被孟軻批評為「貉道」。孟子所持的理由是：北方貉族，「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總之，沒有周文化的統治秩序和禮儀規範，「故二十取一而足也。」然而白圭是魏國名流，「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去人倫則社會無規範，無統治階

²⁴ 參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誤異（增訂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9），第三冊，頁286-287, 216-217。

級的君子則政治失序，可見不行華夏集團的周道，即使中原華夏的老店魏國，也不能算「中國」。正如他對付許行學說抬出堯、舜、皋陶、禹和后稷，批評白圭也說：輕於堯舜之道是大貉小貉，重於堯舜之道是大桀小桀，所以孟子的「中國意識」又從周道上溯到堯舜，鋪陳後世儒家宣揚的道統了。

戰國儒家述古，講論傳統制度文化，但中期的孟軻偶而用「夏」這個詞彙，晚期的荀卿也不多。《荀子·儒效篇》說：「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楚、越、夏的服飾不同，夏大約相當於中原為主的黃河流域，沿襲春秋華夏或諸夏觀念。《正論篇》說：「古者天子……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即在講周王為首的華夏集團。所以同篇說：「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華夏集團因為上頭有國君，故政治秩序和禮儀文化統一，四裔只各別地同習俗而已。

荀卿使用「中國」一詞，涵蓋的地域廣狹不同，小者甚至只限於所謂中心地帶的中原，周邊的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諸霸主，「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王霸篇》）他們可能威脅的「中國」當是中原宋、陳二、三流以下的華夏城邦。這是一層。其次如《疆國篇》盛讚秦逼迫楚國遷都陳蔡之間，「威疆乎湯武」，占有楚的江南，以及韓、趙、魏大片土地，「威動海內，疆殆中國」，其開疆拓土，「廣大乎舜禹」。這裡的「中國」應是秦以外的六國，比中原或諸夏大得多。第三層，荀卿使用的「中國」，範圍最大，見於《王制篇》，把「中國」和北南東西四海相對，北海的走馬、吠犬，南海的羽翮、齒革、曾青、丹干，東海的紫（貝）、結（蚌蛤）、魚、鹽，西海的皮革、文旄都輸入「中國」。在秦統一前夕，約西元前三世紀後半，後世相對於四裔的「中國」意涵已經從當代大儒的口中透露出來了。

《墨子》一書未見春秋的「華夏」、「諸夏」或「夏」、「華」諸詞字，墨翟活動時間雖在春秋末到戰國初，因為不是儒家學派，故無孟軻、荀卿的包袱，其後學更不在話下。不過，他使用了「中國」，有廣狹二義，《親士篇》說：「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恥也），而尚攝（攝）中國之賢君」，雖然曾經敗戰過，而猶足以威懾「中國」，此中國當然指華夏集團。第二層意涵則是相對於四裔的廣大地域。《節葬下篇》論埋葬禮俗，「厚葬久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墨翟舉三個域外例證來批判。他說，越之東的較流國，解食初生的長子，祖父死則背負祖母丟棄山野。楚之南的炎人國，長輩死，朽其肉而埋其骨；秦之西的儀渠國，長輩死，聚柴薪而焚之。然而該國都認為這樣才成為孝子。他問：

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厚〕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薄〕矣。

薄、厚二字我從文義推斷，是顛倒了。三國的葬俗，他們認為已夠厚的，從中國上層階級來看，卻是太單薄了。所以他接著說：

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

彼是三國，此是中國，於是證明那三國是「葬埋有節」的。墨翟把「中國」和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的三國對立，他的「中國」顯然包含春秋時代不屬華夏集團的越、楚和秦，而區隔於秦漢以後的四裔，等同荀卿最廣義的「中國」。這種「中國意識」不是什麼思想家或意見領袖的發明，毋寧是政治社會實情的反映。

(四) 中國本部的奠定

孔子晚年自衛返魯，專事著述，被尊為國老，魯有重大政策往往會諮詢他的意見；而他早年的學生，子路和冉有也甚得第一執政季康子的信任，權傾一時。

《論語·季氏篇》記載季氏將伐顓臾的計畫，派遣這兩位家臣來徵詢孔子。顓臾是風姓小城邦，淵遠流長，上文說過，祖先可以追溯到始畫八卦的太皞伏羲氏。西周時代，周王命這個國家負責東蒙山的祭祀，「在〔魯〕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成為周的附庸國，所以孔子反對把她消滅。冉有辯解說：顓臾城池堅固而且鄰近季氏封邑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可見政策早已決定，徵詢國老不過是禮貌形式而已，即使孔老夫子發了一頓牢騷，什麼「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到底無濟於事。孔子的政治理念可能真的想「興滅國，繼絕世」，《論語·堯曰篇》維持周天子領導下的眾邦，然而時不我予，城邦時代終於結束了。

我以這個小故事說明城邦淪亡的一般模式。其實城邦之滅亡大概從城邦時代開始以來就不斷發生，早期城邦林立，司馬遷說，黃帝時「萬國和」，萬國謂城邦甚多；（《史記·五帝本紀》）孔子的晚輩魯大夫子服景伯也說：「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但據他的見證，到春秋晚期，「其存者無數十焉。」（《左傳》哀公七年）這是子服景伯反對季康子伐邾而發的議論，比孔子反對伐顓臾早五年左右而已。

從夏王朝的萬國至春秋末年剩下不到幾十國，中間隔著武王第一次伐紂，「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史記·殷本紀》加上未叛殷之邦國，當時天下可能有一千多國。由此可以略窺城邦併吞的過程，換言之，後代的大城邦是吞併古代小城的結果，如魯「邦域之中」的顓臾或其鄰近的邾，都是到孔子晚年猶幸存的城邦，但不久之後應該都被魯併吞了。

前輩學者陳槃根據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時代的 209 國，考證其爵姓、地域及存滅。他又考出不見於《春秋大事表》的方國有 57；另外還有疑似為國者得 19 國，²⁵ 三類合計共 285 國。這是見於文獻記載之春秋邦國，不過，司馬遷《史記》春秋年表，只舉十二諸侯而已，即當時的大國，雖然彼此之間仍有強弱大小的差別。

這裡無法一一考證《史記》所列春秋的十二諸侯如何吞併小國，只要指出「中國」形成的趨勢。春秋時代地處中原的華夏諸邦，即使實力屬於二、三流，猶不乏消滅古

²⁵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誤異（增訂本）》；《不見於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

國的記載；那些中原周邊的齊、晉、楚、秦等一流大國，它們之所以大，也是吞併邦域或鄰近城邦的結果。進入戰國時代，今河南、山西、山東、安徽、湖北的小國紛紛被併入三晉、齊、楚，而陝北的戎翟也為秦所滅。以「國」為主體而不是以「城」的地域意識逐漸確立，即宮崎市定所謂的「領土國家」，於是形成秦人、楚人、魏人、趙人、燕人等概念。中原周邊的強國亦不斷深化其有效統治地域，以華夏集團作基盤的「中國」範圍，隨著它們的開疆拓土而擴大，南方的楚、西方的秦、北方的晉和燕，其邊界都超出〈禹貢〉的九州，而出現了《周禮·職方氏》的九州。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禹貢〉的梁州一部分入雍州，另一部分入荊州，徐州入青州，表示戰國時秦、楚、齊在陝西、四川、湖北和山東的整合。而〈職方氏〉從冀州分出幽、并二州，則見趙、燕二國在北方的開拓遠遠超出〈禹貢〉的範圍。揚州也向東南延伸至今浙東，當是納入較晚的禹在會稽的傳說。²⁶

唐賈公彥詮釋〈職方氏〉的九州，總為三道：

河南豫州為一道，

正東青州、河東兗州、正西雍州、東南揚州和正南荊州為二道，

東北幽州、河內冀州、²⁷正北并州為三道。

一道，山鎮是華山包括關中東部及今河南省，是九州的中心地區，即所謂的中原；二道，中原周邊，東含今河南東部及山東省，西邊雍州的山鎮是嶽山，即汧西的吳嶽（鄭玄注），跨入隴東。三道，幽州山鎮曰醫無閭山，在遼東；并州山鎮曰恒山，在晉北。第三道成為戰國時代「中國」的邊界，界外，燕國長城外的東胡、東北的穢、發、高夷與肅慎，燕、趙、秦三國之北的匈奴，秦西疆河洮之外的月氏、烏孫、析支，巴蜀之南的西南夷，楚之西、南的九夷、百濮，越之南的東越、揚越、駱越，都屬於蠻夷戎狄，²⁸和上文徵引《墨子·節葬下篇》秦之西、楚之南、越之東的國家與「中國」對立者符合，後世「四裔」的觀念乃出現。

秦統一六國，「中國」的範圍東止於海，西仍如〈禹貢〉、〈職方氏〉，限於隴西，但南北則略有擴張。秦始皇三十六年（211 BC），秦略取嶺南地，設桂林、象和南海三郡，止於今廣東和廣西，並不包括今貴州和雲南的夜郎、邛都、昆明。²⁹秦帝國的北方，

²⁶ 《周禮·職方氏》賈公彥疏曰：「〈夏本紀〉太史公或言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皇覽》曰：禹冢在山陰會稽山，本苗山縣南七里。《越傳》曰：禹到越，望苗山，會諸侯，爵有德，封有功者，更名曰會稽山。……《呂氏春秋》云：禹葬會稽，不煩徒。《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

²⁷ 《周禮·職方氏》疏：河內冀州和東北幽州，正北并州合稱「三道」，疑誤。據賈疏，冀州偏北之地已分給青州改稱幽州了，其南部接近豫州應該同屬一道才合理。

²⁸ 參譚其驥，〈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戰國時期圖說」，《譚其驥全集》第二卷，頁509。

²⁹ 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秦版圖包括夜郎等地，理由是曾「置吏」，《譚其驥全集》第二卷，頁512）然《漢書·地理志》西南夷地區秦未置郡縣，仍不能算版圖。

「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四十四縣」；又渡黃河，築亭障，設縣，（《史記·秦始皇本紀》）從陝北延伸到河套。這樣的東西南北範圍之內便是秦帝國的版圖。

版圖，《周禮》鄭玄注云：「版，戶籍；圖，地圖。」（《小宰》）官府登記治下家戶的人口名籍，並繪製山川、道路、城邑、村落的地圖。《漢書·地理志》所載帝國治下的郡國，皆記錄其戶數、口數和轄縣名稱，（以後正史地理志的體例皆仿此）就是版圖。中央政府透過郡縣體系設官治民，掌控全國土地和人民兩大資源，構成統治的基礎，即是我說的「編戶齊民」。戰國兩百多年間，諸大國已紛紛編戶齊民化，秦滅六國，順勢接收，後雖一度有人主張恢復殷周封建，但被駁回。自此之後，編戶齊民成爲帝國政治社會結構的基礎，支撐帝制兩千年，至今依然存在。

從長遠的歷史看，秦漢以下至清初，將近一千八、九百年間，中國政權實際有效統治的區域大抵不出秦的版圖，故曰中國本部（圖三）。《馬可波羅行紀》說：「此類島嶼（按，指南中國海諸島）所處之海，名稱秦（Cin, Cim）海，猶言接觸蠻子（蒙古人稱南宋）地方之海也。蓋此類島民語言稱蠻子曰秦，故以名之。」³⁰（第3卷第160章）不止南海諸島的人稱中國曰「秦」，西方人也稱中國爲「秦」，³¹不像中國人受到漢代對前朝污名化的影響，兩千年來諱言「秦」。



圖三：歷代中國本部與勢力範圍（中央研究院 GIS 製）

³⁰ A. J. H. Charignon 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635。

³¹ 西方多種語文稱「中國」，多和拉丁文的 Sina 相關，梵文 Cina，法文 Chine，英文 China 多源自於「秦」，佛經譯作「震旦」或「支那」也多來自梵文 Cina，即「秦」。百餘年前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已提出這個觀點，參看所著〈支那名稱之起源〉（1912），收入伯希和等著，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

三、「中國」的擴張

擴張有多種模式，不限於疆土的開拓，勢力範圍也是另一種形式，古來就如此。版圖具有主權意義，今之中國人很是在意，深怕觸犯政治禁忌，致使歷史學者論及歷代疆域常為所困，出現高度緊張。我們這裡討論「中國」的擴張，即本於古典時代以降的看法，考察不同時期中國政權在有效統治和勢力影響地區的治理或對待方式。

(一) 五服制與「中國」內外

「中國」擴張的模式，最遲可能在三千年前的西周已經成形，至少已有一套完整的論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反對，勸諫他不該耀武揚威，於是述說先王的五服制度：

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國語·周語上》）

甸指周王邦畿，城邦封疆之外是侯、賓、要、荒之服，依其封建爵稱和民族而分作四種類別的土地。服者，韋昭注云：「服其職業」，即是應該負擔的義務，鄭玄注《周禮·職方氏》直言「服事天子」，更加明白。據祭公謀父說的服事，有祭、祀、享、貢、王等不同名稱。

各服負擔輕重差別很大，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甸服者按日提供服務，侯服按月，賓服按季，要服按年，最輕的荒服只當周王登基和自己新即位才來朝見。如果沒有履行職事義務，各邦國所承受的懲罰亦不同，

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

甸服未日祭則按法律行刑，侯服不月祀則伐，賓服不時享則征，二者皆用兵，可能規模有大小之異。要服不歲貢則予以譴責，荒服不終王只是警告而已。

如此規整的五服制是否真實存在，或者徹底執行？固然無法證實，不過不同類別的諸侯邦國的確見於周初銅器銘文和可靠的文獻。〈令彝〉曰：「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三事指周王朝廷的官吏僚屬，《周書·酒誥》謂之內服，³²而四方則指

³² 〈令彝〉的三事包括卿族（事）寮、諸尹、里君、百工，〈酒誥〉內服包括亞、服、宗工的百僚庶尹，還有百姓里居（君）。凡此僚吏，《尚書·立政》說得比較詳細，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雖然他們的職責不能盡明，但視作官僚是沒有問題的。最後還有「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三夷狄和三地名，蔡沈《書經集傳》曰：「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故屬內服。參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

諸侯，其名目分「侯、甸、男」三種，〈酒誥〉謂之外服，包括「侯、甸、男、衛」四種。不論三種或四種，都屬於祭公謀父說的甸、侯、賓三服，即上文所論之華夏集團，另外的蠻夷和戎狄之兩服，〈令彝〉、〈酒誥〉未涉及。

甸在周初是指王廷以外的一種諸侯，從傳世文獻我們知道周王直接統治的王畿內存在著大小不等的諸侯，擁有封地，今日關中出土的青銅器也可證明這種情況，故「甸」可以是諸侯之稱。不過「甸」也指王畿，故曰畿甸，係周王直接統治的邦域，在城邦時代謂之周邦，便指邦畿內的庶民，即祭公謀父所謂的「邦內甸服」，也是〈禹貢〉的甸服。

〈禹貢〉的系統把天下分作甸、侯、綏、要、荒五種服，如果不計較每服機械的五百里，而考察它們的職事，也有相當的合理性，應該透露一些歷史訊息。各服的負擔，王畿的甸服最重，其中又以距離京師遠近而有輕重之別，天子腳下的人民則是重中之重。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銍是禾穗，秸服是帶稃之穀，粟是穀帶殼，米則去殼，總指全部，包括餵飼國馬的稟（稗）。甸服內的人民提供周王室、政府官員以及守衛士卒的糧食和牲口飼料。

王畿之外，第一層五百里侯服，分采、男邦和諸侯三類，第二層五百里綏服，較近者行文教，稍遠則奮武衛，負責天子的安全，因為到這裡算是華夏集團的邊界，再外就是蠻夷了。第三層五百里要服，近者為夷狄之地，遠者「蔡」，放逐罪人於此。（蔡沈《集傳》）最外層五百里荒服，近者「蠻」，不制以法；（孔安國《傳》）遠者「流」，流放重罪犯人。

不論〈周語〉或〈禹貢〉，五服之「服」都是職事，然而表面上不同地區負擔的輕重也顯示周王對該地區控制程度的深淺，〈禹貢〉機械地按距離京師的里程來鋪陳周的統治秩序，顯然是理想化的藍圖，與戎狄交錯於華夏的歷史實情不符。然而如果以直接控制與勢力影響來看周王朝的統治手段，古典文獻亦不無反映相當的史實。

〈周語〉和〈禹貢〉的五服都分作王畿、華夏集團和蠻夷戎狄三類，完全符合城邦時代的天下秩序。王畿與華夏集團是「內」，蠻夷戎狄是「外」，此即《公羊傳》所說的「內諸夏而外夷狄。」（成公十五年）這套架構傳到戰國，天下擴大了，《周禮》作者加以斟酌損益，創出九服，（〈職方氏〉）也稱作九畿，（〈大司馬〉）王畿（國）外，以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蕃）為名，與五服之名略有異同，甚至可以追溯到周初文獻。即使九服，也同樣沒有超出五服三類的架構。不過在秦征服六國

之後，天下一統，凡「中國」之人民和土地都在皇帝統治之下，於是第二類的華夏集團，即五服制的侯服、賓（綏）服，或九服制的侯、甸、男、采、衛，都王畿化而變成「中國」本部，構成「中國」的「內」。本部之外的蠻夷戎狄，謂之四裔，則為「中國」之「外」。借用班固的話說，這是「先王度土……制外內」，（《漢書·匈奴列傳》）然而這套系統缺乏「外國」的觀念，中國人很晚才承認有「外國」，還是在特殊的情況發生，下文將會討論。

皇帝在中國本部設官治民，中央政府之下建立郡縣制的行政組織，按縣、郡或其他各種地方政府之名目，統治轄下的編戶齊民；齊民的負擔不似〈禹貢〉甸服那般繁瑣，而如孟子所云「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盡心下》）城邦時代不論是周王畿的庶民或諸侯邦國內的人民，對各統治者不只提供農作生產的五穀而已，還有家庭手工業的布帛，和各種輪值的徭役與兵役。齊民的負擔，孟子概括為布縷、粟米和力役三種徵調，成為秦漢帝國以下編戶齊民負擔的主要項目，唐代的名目謂之租、庸、調，完全符合。歷來稅制改革，不論兩稅法或一條鞭，統治者取之於齊民的項目和原則，基本沒有改變。

中國拓展其直接統治區，擴張模式是先軍事征服占有其地，然後設官治民；新征服地多比較空曠，居民原非本國人，故中國政府往往遷徙本部人口去填補，歷史上謂之「移民實邊」，秦始皇在「中國」邊界外南北的擴張就是這種模式。《史記·秦始皇本紀》說：

三十三年（214 BC）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謫）遣戍。

陸梁指嶺南，（《史記正義》）嶺南還是部落社會，未形成國家，沒有龐大的軍備，故不必動用正規軍，而組織中國本部邊緣人口進行「略取」，設置三個郡，派遣罪犯入住，既是移民，也負責戍守。同年對武力強大的匈奴則不同，需要正規軍，〈秦始皇本紀〉說：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四十四縣，城河上為塞。
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陽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

攻占陝北至陰山的匈奴地域，設 44 縣，沿河築城塞，又渡河，擴張領土，築軍哨防守，遷徙內地罪犯來充實新郡縣。

新征服區郡縣化後，未逃走的原居人口自然編戶齊民化，地方政府申報的戶口和賦稅，中央政府都有檔案記錄，作為政權的基礎，歷史上謂之「納入版圖」。

漢武帝時代，本來隸於匈奴的河西走廊被納入漢帝國版圖，也是這種模式。《漢書·西域傳上》概括其大要曰：

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跡。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

河西四郡共設 35 縣，《漢書·地理志下》分別記錄其戶、口數和各縣的名稱。

秦漢的新征服地設郡縣充實人口，編戶齊民化，把原來的「外」變成直接統治的「內」。而河西走廊，漢的版圖止於敦煌，猶如〈西域傳上〉所說：「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敦煌以西不能算「中國」的範圍，算什麼呢？可以稱作勢力範圍。

(二)「中國」的勢力範圍

中國對勢力圈的影響程度，大小不一，難以一概而論，茲就幾種模式略加說明。

從五服制的「甸服」到中國本部的編戶齊民，也就是從城邦到帝制，中國人一貫的看法是，中央控制地方的戶口和土地才符合直接統治的標準，其他各「服」都只算是不同程度的勢力範圍而已。帝國影響或左右外國的方式，古書謂之「羈縻」。漢武帝征西南夷，置郡縣，也就是把夷人編戶齊民化，蜀地父老則多不以為然，說：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羈是馬絡頭，縻是牛紉（牛鼻繩），用韁索把牛馬牲口套住，不讓跑掉，但他們仍有相當程度的獨立自主性。西域諸國在漢王朝勢力籠罩之下，即是羈縻，不過因時、因地、因人，影響或控制深淺有別而已。

羈縻手段即使不一，基本精神是一貫的，多反映帝國的本質，可藉以了解「什麼是中國人」這個難解的問題。茲據《漢書》所述故事，舉漢代開拓西域的幾個代表性人物，以見一般。

昭帝時代「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且「皆嘗殺漢使者」，傅介子先前曾出使大宛，路過這兩國而了解其國情。他們的國王親「近就人」，不設嚴密安全防範，傅介子認為容易刺殺，可「以威示諸國」。他取得霍光的同意，先對較鄰近的樓蘭下手，於是攜帶金幣出使西域，揚言賜給外國。使節團誘騙樓蘭王來見，予以招待，當喝得醉醺醺時，介子假稱漢帝有話要私下轉告樓蘭王，支開護衛，走入軍帳，不期「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傅介子割下樓蘭王首級，出來對樓蘭國人宣告：

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漢書·卷七〇·傅介子傳》）

於是持王首回國向皇帝報告，皇帝讓諸大臣討論，「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朝廷公開肯定傅介子的作為。

傅介子是使者，只有少數隨從，未帶領軍隊，而以欺詐偷襲方式斬殺國王，並且威脅樓蘭人，如果殺了他們使節團，漢朝大軍不久將至，就把整個國家滅掉。他又宣示立在漢當人質的前太子為王，顯然扶植一個傀儡。這故事顯示漢在西域尚無據點，亦未駐軍，但干涉內政，不擇手段建立親漢政權，打破匈奴對西域的籠罩。西域開拓需要如傅介子這類梟雄，但也因為有強大的國力作後盾，才產生威嚇震懾，這是建立勢力範圍的一種方式。

爾後，常惠獲得霍光默許，「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漢書·卷七〇·常惠傳》）一介使者手下只有區區五百文官武卒，竟然徵得西域諸國約五萬士兵來指揮，以攻打不服從的國家，這種模式以後也常被援用。

徵調之外，漢帝國進一層選在戰略要衝建立據點，長駐軍隊。唯漢去西域遙遠，駐紮之士卒有限，必要時才從中國本部調兵馳援，故需維持道路暢通，一如西周王朝往東土的周道，（《小雅·大東》）或秦統一後之治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漢書·賈山傳》）皆方便鎮壓。

駐軍首長稱西域都護，都護是加官，宣帝時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漢書·百官公卿表》）然而重點是在護道，故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黎，「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升也）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漢書·卷七〇·鄭吉傳》）據《漢書·西域傳上》，此「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其後日逐王叛單于歸降，帝使鄭吉迎之，「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可見漢帝國最初在西域所置官僚的職責是監管並控制天山南北兩條道路，以連繫中國本部到中亞、西亞的交通暢通。誠如論者指出的，此暢通不以貿易為主要目的，而是要以道路加強漢王朝與西域諸國聯繫，以便保障對西域的嚴密管控。管控西域的目的則在打擊匈奴，這才是漢帝國的戰略。³³

漢帝國建立據點後，糧食仍難遠運，戍卒屯田以自給。然而漢駐軍依然有限，陳湯欲襲擊遠在康居的郅支單于，發屯田吏士和西域諸國兵，（《漢書·卷七〇·陳湯傳》）仍然要靠漢帝國之威徵調西域諸國兵卒。

漢之控制西域，到東漢前期的都護班超達於巔峰，他的手法可謂集武帝以來種種經驗之大成。首先漢兵為數同樣少，且不說最初只「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他駐守西域將近三十年，多次征伐，史書不是說「士吏單少」，就說「衆少」。這麼長久

³³ 參張瑛，〈漢代西域都護設置的時間及其職責相關問題考辨〉，《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3：120-128。

的鎮戍，朝廷只兩次派遣士卒前來，一次是弛刑及義從千人，一次兵士八百，所以歷次征戰還是靠徵調諸國兵。（《後漢書·班超列傳》）《後漢書》本傳的徵兵記錄，章帝建初三年（78）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元和元年（84）「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四年後再「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和帝永元六年（94），「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此役漢軍連在西域做生意的商賈都派上，亦不過千餘人而已。第二年朝廷封班超為定遠侯，詔書說他「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完全是事實；而在外交戰略上，正實踐他向朝廷建議的「以夷狄攻夷狄」之策。

其次，班超多使用誘殺手段，對疏勒、焉耆之例即是。他偽許疏勒王忠投降，忠輕騎簡從，「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永元六年發八國兵討焉耆，班超先揚言欲賜焉耆王繒綵，放走來迎的親匈奴派左將北鞬支，所謂欲擒故縱也。焉耆恃深水之險，超從它道強渡，出其不意，逼近王城，王與國人共入山堅守。班超又殺死來告密的親漢派左侯元孟，以示不信焉耆王會叛漢，然後定日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尉犁兩國王及貴人大臣相率詣超。超佈置吏士加以逮捕，斬於陳睦故城，為先前被焉耆攻沒的都護陳睦報仇。這一招和傅介子之誘殺樓蘭王如出一轍。

班超在西域諸國也扶植親漢派，建初三年（78）向朝廷分析西域諸國的匈漢外交路線，認為只焉耆、龜茲未服，就建議「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侍子即質子，白霸此時在長安，十三年後龜茲等國皆降，朝廷「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班超和姚光脅迫龜茲貴人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然後姚光帶著尤利多還詣京師，好使白霸王位坐得安穩。

扶植龜茲白霸之前，班超更立疏勒國的府丞成大為王，疏勒分裂成兩派，超攻疏勒王忠，康居遣精兵助忠。班超賄賂與康居新婚的月氏王勸康居王罷兵，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三年後忠被班超設宴誘殺，如上面說的故事。

兩漢西域的經營多立基於有膽識、有謀略的梟雄人物身上，挾帝國的聲威，利用人性的善良或弱點，行「兵不厭詐」的誘騙手段，操縱於諸國之間。這種方式造成漢廷的西域經營，興衰存滅多繫於都護的膽識與才能，但人存勢力在，人亡勢力散。總而言之，西域是漢帝國的勢力範圍，和編戶齊民的本部（內地）完全不同，兩漢書地理志（郡國志）未列西域三十六國即是這緣故。至於更遠的烏孫、康居、大宛、月氏，比起鄯善、樓蘭、焉耆、龜茲、于寘、疏勒等，漢的影響力又更小，不能混為一談。

《隋書·西域傳》史臣論中國勢力擴張的根本原因曰：

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

皇帝好大喜功，自然有不怕死的臣子來投效，他們的手段，說穿了也很簡單，不外利誘和威脅。《隋書》的評論雖指兩漢，後世也脫離不了此一論斷。

自從秦漢形成廣土眾民的帝國之後，中國以其雄厚國力，隨著統治者的才略和好惡，的確可以傾全國之力達成目的。故其國威可以遠播，勢力範圍可以無遠弗屆，但即使所謂漢唐盛世，同一朝代往往只是短期的狀況而已。

再進一層控制則是設置行政機構，但名目雖比照本部，實質仍屬於勢力範圍而已，李唐在高麗、西域即採行這種模式。《新唐書·地理志一》曰：「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據開元二十八年（740）戶部帳，郡府 328，縣 1,573，戶 8,412,871，口 48,143,609。此一數據應包含邊區都護府和羈縻州，帳面上羈縻地區的戶口申報到中央，但與本部不同。

唐都護府是征服區，西域方面，伊州置三縣，西州五縣，而北庭和安西兩個大都護府，前者是貞觀十四年（640）平高昌，以西突厥泥伏沙鉢羅葉護阿史那賀魯部落置，後者是顯慶二年（657）平賀魯，析其地「分種落列置州縣。」（〈地理志四〉）另外，羈縻州，分別隸屬關內、河北、隴右、劍南、江南與嶺南諸道，設府、州 856，並未置縣，控制可能更鬆緩。雖然《唐六典》規定「凡諸國蕃胡內附者，亦定戶為九等」，分上、次、下三類，賦役不同，（卷三戶部郎中員外郎條）似乎如本部之「齊民化」了，其實不然。《新唐書·地理志七下》羈縻州序曰：

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于令式。

實際治理的大小官吏皆用其本民族，高官大員甚至世襲，顯然是高度自治，只在名分上奉唐皇帝為最高統治者而已。一如克服高麗國，分其地為九都督府，設州 42，縣 100，「用其酋渠為都督、刺史、縣令」，雖然在制度上採行中國本部的郡縣制，實質上仍然高麗人統治。

漢唐的羈縻方式雖然有些差異，內涵本質則見後一貫，班固〈匈奴傳〉論「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正指出其心態。他說，駕御外國：

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

匈奴這種與漢勢均力敵而且對抗的國家，中國固不可能施以政教，要求奉正朔。像班固所代表的儒家的觀念，蠻夷「人面獸心」，生活完全與中國不同，「聖王禽獸畜之。」他們夠不上人，故中國既不與立盟約誓，也不必討伐，這應該是羈縻政策的心態吧。這些不同羈縻程度的國家，中國從未建立軍事據點至設置郡縣行政系統（名義上的），即使官方曾奉中國之正朔，如果不派中國人去管理，肯定無法推行中國的政教。

歷史上中國疆域的範圍到哪裡？是涉及政治是否正確的敏感問題，論者往往罔顧事實，往中央直接統治說靠攏，其實探討王朝對羈縻地控制的程度，才是實事求是的作法。唐王朝之於西域，中國學者諸說之中有一種看法認為，唐羈縻府州的首領仍是原來各國的統治者，職務世襲，唐不干預其內政。民丁不編戶，收入不隸戶部，不納賦稅，有別於郡縣制下的漢民編戶。但外交、軍事要服從唐朝，首領接受冊封，並朝貢、朝覲以表示臣服，還有勤王助戰的義務。³⁴此一論斷比較符合史實。

中國西南的羈縻政策和西北截然不同，概言之，對西域的經營，戰略意義大於經濟，如漢為對付匈奴，唐為對付突厥；但對尚停留在部落組織、尚未形成大政治體的西南地區，自然資源和政治號召才是主要動力。企圖北伐的諸葛亮之進兵南中，「七擒猛獲」，陳壽說：「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正道出歷史的奧秘。一旦成為勢力範圍，又構不成威脅，便無駐軍留守之必要。因為兵留則無所食，若只派文官沒有軍隊保護，必釀禍患，當地人終不相信外來統治者。所以諸葛亮制定出「不留兵，不運糧」的政策，只要求「綱紀粗定，夷漢粗安」就好。（《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

諸葛亮南中經營策略，唐朝官拜蜀州刺史的張柬之看得最清楚，他向朝廷的建議指出，這裡的經濟利益，東漢政府「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諸葛亮南征以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而且「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舊唐書·卷九一·張柬之傳》）政治上只要奉中央為首，經濟利益源源不絕地提供，是上上之策。

西南非漢地區不駐軍的羈縻政策，中央的管控比西域還寬鬆，多為後代政府所繼承。雖然不同王朝對當地酋帥封官加爵，授予刺史、郡守、縣令的官爵，或王、侯的爵號，還有名目繁多的品秩，但都是表示恩寵的虛銜而已。這些官職皆由當地原來的統治者擔任，故法律習俗一仍其舊，宋真宗「常戒邊臣，無得侵擾，外夷若自相殺傷，有本土之法，苟以國法繩之，則必生事，羈縻之道正在於此。」³⁵那個地方行「本土之法」，不用中國本部的「國法」，即從其舊慣的意思，只要歸順中央，一切自主。

³⁴ 苗普生、田衛疆主編，《新疆史綱》（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頁164。

³⁵ 《宋會要輯稿》第149冊〈蕃夷五〉之四三，引自龔蔭，《中國土司制度》（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2），頁21。

西南羈縻地的統治者過去稱作「土官」，元代實施土官土司制度，乃有「土司」之稱。土司職官有宣慰、宣撫、安撫、招討諸銜，土官有總管、土府、土州、土縣；據研究，中上級「參用土人」，基層都「以土酋爲官」。³⁶明代「踵元故事」，《明史·土司列傳》敘曰：

其道在於羈縻。彼大姓相擅，世積威約，而必假我爵祿，寵之名號，乃易爲統攝，故奔走惟命。

土司皆當地大姓，世代相傳，據明朝官方認爲授以明的官銜爵號，不過更方便統治而已。但王朝目的即在經濟利益，由於需索無度，「調遣日繁」，在地雄長有實力，有威望，自然容易反抗，形成「叛服不常」的局面，故史官總結土司制度「利害各半」。（同上）但在制度上，土司要納貢和服徭役，無需交納賦稅，與內地不同。及至清人完成《明史》之前，土司制度已經廢除，改爲流官，結束千餘年的自治或半自治，才齊民化、「內地化」。

明朝邊區勢力所及之地，參用土官不限於西南的土司，在東北的奴兒干都司雖採衛所制度，也多任用原住民之雄長統治，原始史料有名的「永寧寺記碑」充分證明「以土酋爲官」的實情。明初曾數度派遣使臣至奴兒干國，碑文云，永樂九年（1411）春，內官女真人亦失哈「率官軍一千餘人，巨船二十五艘，復至其國，開設奴兒干都司。」翌年冬，復命亦失哈再至，「賜男婦以衣服器用，給以穀米，宴以酒饌。」第三次，永樂十一年（1413）秋，亦失哈選在都司衙門西觀音堂舊地興建永寧寺，立碑作記（圖四），³⁷以期「子子孫孫，世世臣服，永無異意。」碑文主要是歌頌皇恩國威，但後半記錄一長串的名字及頭銜，上自身分最高的欽差，下至各種匠人，幾乎巨細靡遺。這些人可能是建寺立碑相關人員的名冊，但也多少可以反映明帝國勢力範圍地區的統治結構。茲擇要條例數則，以見其梗概。



圖四：永寧寺石經幢（已毀）
（引自：維基百科 <https://reurl.cc/aG5RQD>）

欽差四人，皆宦官，爲首亦失哈，女真人，另外〔成〕□勝、張童兒、張定安三位係朝鮮人。³⁸

³⁶ 參龔蔭，《中國土司制度》，頁 31。

³⁷ 參鍾民岩、那森柏、金啓琮，〈明代奴兒干永寧寺碑記校釋〉，《考古學報》1975.2：33-56；金光平、金啓琮，《女真語言文字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 355-376，〈永寧寺碑〉譯釋。

³⁸ 上引〈明代奴兒干永寧寺碑記校釋〉，考兩張見於《朝鮮實錄》世宗十三年（1431）八月條：「內官昌盛、張童兒、張定安嘗一同奉命往東北」。

其次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張旺，也有可能是朝鮮人。

再次如撫總正千戶：王迷失帖、王木哈里。

玄城衛指揮簽事失禿魯若，弗提衛指揮簽事禿稱哈；男弗提衛千戶納藍；千戶：吳者因帖木兒、馬兀良哈等；百戶如□得試奴、劉賽因不花、王□里帖木、王阿哈納、康速合、阿卜哈、哈赤白等。

所鎮撫：宋不花、王速不哈、李海赤、高歹都等。來降快活城安樂州千戶：王兒卜、木答兀。

卜里阿衛鎮撫：阿可里、阿刺卜。百戶：阿刺帖木、□納。

所鎮撫：賽因塔、把禿不花、付里住、火羅孫。自在州千戶：□刺□、哈弗□的、阿里哥出；百戶：滿禿□。

奴兒干都司都指揮同知：康旺，都指揮簽事：佟答刺哈。

按漢文碑記女真字書手名康安，女真文碑記書寫人遼東女真康安，則此碑奴兒干都司最高長官康旺當是女真人，此碑上面的欽差、鎮國將軍等並不長駐奴兒干都司，長駐者是在地的女真人。另外還有更多的部落頭人，接受欽差代表皇帝賞賜後返回原部落，都沒有記錄。

漢文碑記說，永樂九年開設奴兒干都司，

昔遼、金疇民³⁹安故業，皆相慶……遂上□朝□□□都司，而餘人上授以官爵印信，賜以衣服，〔賞〕以布鈔，大賚而還。依土立興衛所，收集舊部人民，使之自相統屬。

蒙古文碑云有「百餘人晉謁」，「令其故土設立萬戶衙門，使之統帥舊部人民。」（漢譯）女真碑文亦曰：「按土著地方設立萬戶衙門，使統率舊部人民。」（漢譯）⁴⁰上舉永樂十一年碑記名姓約百人，除少數可以確定漢人者外，多是女真人。宣德七年（1432）亦失哈再來奴兒干視察，翌年重建二十年前的永寧寺，又立重建永寧寺記碑，所錄人名也多是女真人，中央大員之外，最高的遼東都司都指揮康政，奴兒干都指揮康福都是女真人。⁴¹前後兩碑都證實我們的推斷，明代奴兒干都司官員的任命，即使中上級也不只是「參用土人」而已。一旦中央權威衰落，軍事失勢，連名義上的臣服也維繫不住，明王朝終於被女真人取代。

³⁹ 疇民，〈明代奴兒干永寧寺碑記校釋〉考證云，《滿州金石志》作「時」，《滿州金石志稿》作「儔」，茲據烏居龍藏影本釋作「疇」，前也，疇民即前代之人，指遼金所轄奴兒干人民的後裔。

⁴⁰ 蒙古文、女真文碑文皆見上引鍾民岩等，〈明代奴兒干永寧寺碑記校釋〉。

⁴¹ 鍾民岩等，〈明代奴兒干永寧寺碑記校釋〉。

女真入關建立清朝，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多年的經營，收蒙古、克回疆、拉近青藏，直控雲貴，疆域遠遠超越秦始皇的中國，為一萬年以來所未有。不過帝國的治理大體還是繼承傳統分直接統治與勢力範圍，不是一律看待。只是當中國納入世界體系，成為近代國家的一員，全民真正一統，這個多民族多文化帝國後裔便遇到新的難題。這個難道有其文化基因，源自帝國傳統對直接統治的人口要進行文化改造，缺乏多元文化並存的意識。

(三) 文化改造為「中國人」

「中國」的擴張，在軍事征服與設官治民之後，繼之以文化改造，使該地居民變成「中國人」。只有征服了才能設官，只有設官了才可能實施「教化」，三者缺一，都不可能「內地化」，不可能充分的「中國化」。班固謂古之聖王對待夷狄，「不與約誓，不就攻伐，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是從軍、政、教立言；歷史事實則反古聖王之道而行——要征服，要治理，還要改造，否則中國將永遠限縮在「原中國」、或「中國本部」的範圍內，不會出現後世所謂的漢唐盛世。

所教化者是以儒術為主的中國文化，歷史上有名的首倡人是西漢的蜀郡太守文翁。蜀具有悠久歷史和璀璨文明，雖被中國政權征服已歷 190 年，可還保持濃厚的本土文化，遂被主流意識污名化，說多蠻夷之風。（〈文翁傳〉）文翁「好教化」，遂選「開敏有材」的郡縣小吏，「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蜀生成就歸返，獲得晉升，有提拔至郡守、刺史，這些人肯定會成為「教化部隊」。

文翁又在成都市中建造學官宿舍，招四郊外縣子弟入學，給予免除徭役和兵役的優待，成績優等者補郡縣吏，次者可撈個「孝弟力田」，成為故鄉的士紳。他也挑選在學生見習吏事，明經飭行者隨從行縣考察，使傳教令，形同太守的私人秘書。縣邑吏民看了都非常羨慕，數年之間，人人「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甚至出錢請求讓子弟上學。據說原本「有蠻夷風」的蜀郡，「繇是大化」，而留學於京師的人眾多，可與儒家大本營的齊魯比肩。

中國本部的整合，軍事征服早在西元前二二一年完成，隨即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設官治民，有理民的郡守、帶兵的郡尉和督察官員的監御史。中央選派官員自然會帶來新文化，不過秦是以吏為師，雖然地方官督導的條目頗多符合儒家倫理，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為吏之道》可以證明，⁴²但把文化改造當作一項政務，而且奉儒學為準則，恐怕是從景帝末年文翁為蜀郡太守才開始。

⁴² 如《為吏之道》有云：「寬俗（容）忠信，和平毋怨，悔過勿重。茲（慈）下勿陵，敬上勿犯，聽聞（諫）勿塞。」參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頁 281。

不久漢武帝即位，崇尚儒術，中央先置五經博士，又增博士弟子員，地方上可能採行文翁模式，「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爾後歷朝歷代多奉為典範，甚至作為評價地方首長行政優劣的重要指標，史書的循吏傳就包含這種推行文教的地方官，給予高度肯定。此一制度與風氣，促使春秋或戰國時期的蠻夷戎狄地區，在中央政權的教化下而一步步「華夏化」、「儒化」、「中國化」。這是一項漫長的過程，即使在秦始皇就完成的「中國本部」，兩千年後猶有「化外」之民，何況後來擴張的勢力影響區，今日中國當局仍然在進行文化改造工作。

中國人認為凡非官方認可的信仰、倫理、禮儀和習俗都是下等或野蠻的，故本部周邊地區納入版圖後，都要進行文化改造，東漢初的任延即是有名的一例。

《後漢書·循吏列傳》曰：建武（25-55）初詔徵任延為九真太守，

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

注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屬於原始燒山遊農，其民經濟來源以狩獵為主。任延教導郡民先進的農耕技術，社群不再循環地移動，固定的村落於是誕生。

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敵）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

南越民族的婚俗和倫理道德當如近代民族誌的記載，但與儒家禮法不同，遂被污名化，中國文獻對非漢的禮俗論述幾乎都是這種論調。任延乃「移書屬縣」，靠政治力量強加改造，命令他們「以年齒相配」。據說這一年「風雨順節，穀稼豐衍」，真神奇，文化改造也會感動天地！於是「其產子者，始知種姓」。恐怕南越的族系標識非如中國的姓氏罷了，不是任延出任太守之前，九真社會仍然停留在原始洪荒階段。

漢武帝元鼎五年（112 BC），發水陸兩軍征西南夷，兵分五路，從今湖南、江西、貴州南進，其中有兩路的統帥是越人。漢遠征軍會師於番禺（今廣州），經過征伐，第二年乃設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和日南七郡，涵蓋今廣東全省、湖南南部與廣西東部，以及越南中、北部。⁴⁹九真是這七郡南端倒數第二個，離中國本部極其遙遠，任延的「神奇」政績遂被特別稱道，比他早二十年的交趾太守錫光，亦「教導民夷，漸以禮義」，據說「化聲侔延」，但沒有像任延的精彩故事傳世。范曄總結說：「領（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後漢書·循吏列傳》）這兩位統治今越南中北部地方官，他們的故事足以證明軍事征服——設官治民——文化改造三者一體，只是文化改造不像軍政那麼容易，中國南方的「蠻夷」直到二十世紀依然沒能改造淨盡，還留下一些殘餘供民族學家研究。

⁴⁹ 參《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六年，及《地理志》相關諸郡條。

兩千年來長江以南的「漢化」或「中國化」是歷朝政權及其官僚不斷進行的工程，我們只說一個歷史故事和一篇近代研究以概其餘。故事是唐朝的「開漳聖王」陳元光。

《全唐文》卷一六四收錄武后垂拱二年（686）陳元光呈給中央的〈請建州縣表〉，得知他在高宗永淳二年（683）繼其父陳政為嶺南行軍總管，所管轄的地區，

地極七閩，境連百粵，左社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餘。

閩南和粵東相連，族群多半是蠻夷，其生業也和上述漢代九真相似，燒山遊農。而這裡的人民鮮少定居，經常流動，官府就不好掌控，不守法紀，「窮兇極暴」。如此積弊超過十年，一度被他平定，「元惡既誅」，但不久「餘兇復起」。他發現「法隨出而奸隨生，功愈勞而效愈寡」；深深體悟「兵革徒威於外，禮讓乃格其心」，根本之道只有教化。但由於「職方久廢，學校不興」，才這麼難治。

對這些狩獵橫暴的蠻夷，誅不勝誅，徙難盡徙，他建議的解決之道是：

其本則在創州縣，其要則在興庠序。

設立地方行政機構，派官治理，所謂「建治所而注頒官吏」；地方官尤其要先建學校，進行教化，因為「倫理謹則風俗自爾漸孚，治理彰則民心自知感激。」

陳元光的行事和建議，正是軍事征服、設官治民和教化改造三者一貫的擴張模式。他說他的建議雖是「救時之急務」，亦「循往古之良規」，過去「中國」的擴張就採用這個模式的。嶺南行軍總管的治所臨近漳水，兩年後武則天果然批准設置漳州，授陳元光「持節漳州軍事、守漳州刺史」之官職。（《全唐文》卷一六四〈漳州刺史謝表〉）

然而歷史發展不會這麼輕易，雖然設官治民了，原住民不可能立刻乖乖就範，軍事壓鎮仍然持續進行，不久陳元光在一次剿滅「蠻賊」的戰役中戰死。⁴⁴所謂蠻夷可以考出是今畚族的祖先，當然從中國長遠的發展看，閩南的確逐漸漢化、儒家化、中國化，到宋朝便文風鼎盛，人才輩出了。陳元光遂被當地人尊為「開漳聖王」，變成民間信奉的神明，也稱「威惠王」，威而後惠，正是從軍事征服到文化改造的寫照，即是中國的擴張模式（圖五）。閩南一如他所預言的，經過教化，必然會「秦越百家愈無罅隙，畿荒一德更有何殊？」原住民文化消失，就變成「中國人」了，故荒服之地整合成爲「中國」的一部分。

⁴⁴ 陳元光，舊、新《唐書》皆無傳，除《全唐文》所收〈請建州縣表〉與〈漳州刺史謝表〉是直接史料外，其事蹟都是後世地方志摭拾民間傳說或地方史料整理而成的小傳。關於他的戰死，《大明漳州府志》卷一四〈列傳·唐·知州〉陳元光條曰：「後帥輕騎討賊，援兵失期，力戰而死。」《光州志》卷五〈忠義列傳〉陳元光條曰：「未幾，蠻寇鴟張，潛抵岳山，元光往討之，步兵後期，爲賊所殞。百姓哀之，肖其像以祀於綏安溪之大峙。先天元年（712）事聞，詔贈官，謚忠義。」陳元光之父來自河南光州，故《光州志》視爲鄉賢；而他戰死於雲霄岳山（今稱拜嶽山），故《雲霄縣志》亦記其事。《雲霄縣志》卷一三〈秩官〉刺史陳元光條提到「蠻寇雷萬興、苗自成之子糾黨復起于潮，猝抵岳山。」雷姓是傳說盤瓠苗裔的畚族，屬於「蠻夷」。《雲霄縣志》明言元光卒於景雲二年（711），但此志成書晚到民國，而謂元光上疏建州在嗣聖三年，嗣聖只有元年（684），並且與〈請建州縣表〉的西元686年抵觸，不可信。



圖五：威惠廟

(左) 福建詔安岑頭威惠廟 (引自：百科知識中文網 <https://reurl.cc/9pZx0v>)

(右) 彰化威惠廟 (引自：<https://blog.xuite.net/a7771381/twblog/120281126>)

陳元光正史無傳，幸好他留有兩篇疏奏我們才得以知道他在閩南的作為，可以建構之所以成為「中國人」的過程，解答「中國人」如何形成的疑難。像他這種案例的地方首長應該不少，中央視若平常，以致難能進入國家級的正史。

從近代學者對湖南人血統的考察，也可獲得類似佐證。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在上個世紀三〇年代研究近代湖南人的蠻族血統，⁴⁵ 討論宋代以下一千年湖南「漢化」的情況。這個問題傳統史料存在許多先天的缺陷，一則史籍鮮少記載，再則譜牒曲諱而掩飾，那時沒有 DNA 檢測，想在久已混合的民族中探索蠻族祖源幾乎不可能，不過譚氏仍有適度的方法可以追尋一些痕跡。他同樣只能運用傳統史料，但「區以地域，證以古今望族蠻酋姓氏之因緣遷變」，尤其集中於姓氏的考察，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他統計湖南各府、縣志選舉志有功名者，湘西各縣蠻姓占全縣少者 1/5，多至 1/3 以上。鳳凰、通道兩縣幾乎占有一半，瀘溪、會同、溆浦四成，三成以上者有乾州、麻陽、黔陽，二成以上者辰溪、永綏、芷江、綏寧、永順、龍山、城步等縣。凡此統計皆限於父系，若計算母系，比數一定更大，何況那些漢化已深，諱言蠻祖者更無從追溯。譚氏深知其統計數目的缺陷，故曰，蠻族原無譜牒，「迨夫知書習禮，門第既盛，方有事於譜牒，或已數典而忘祖，或諱其所出，乃以遠祖托名於往代偉人，臆造其徙移經過，易世而後莫究。」譚氏的另一篇研究，〈湖南人的由來〉，⁴⁶ 據方志氏族志和文集與文徵的族譜序所作的統計，湖南大量外省移民應該也有相當比例是編造移民歷史的蠻族。

譚氏發現湖南境內，因同為一地之蠻姓，著稱於唐宋者，至明清大率已變為漢；而著稱於明清者，唐宋尚無所聞，遂推測當時猶辟處深山窮谷，與漢族極少接觸，故

⁴⁵ 譚其驤，《長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 361-392。

⁴⁶ 譚其驤，《長水集》，頁 300-360。

無記錄。換言之，蠻變為漢的趨勢是從「生蠻」轉為「熟蠻」，再進一步轉化為「漢」。一如臺灣原住民從「生番」轉為「化番」、「熟番」，再變成漢人。譚氏在湖南觀察到中國歷代政府常用的政策是「餌熟蠻以利祿，使征生蠻」；我們也知道清政府統治臺灣，利用「熟番」征討「生番」的歷史。

唐宋以來的漢化，不限於湖南，通長江以南大抵亦經歷類似的模式；其實不限於最近一千年，兩千年前甚至更早也已經開始，隨著「中國」的發展而一步步深化，只是各地先後進程有異罷了，到最後只要在中國政權統治中，不只名義上，實質也都變成了「中國人」，「數典忘祖」遂為許多自稱炎黃子孫者的常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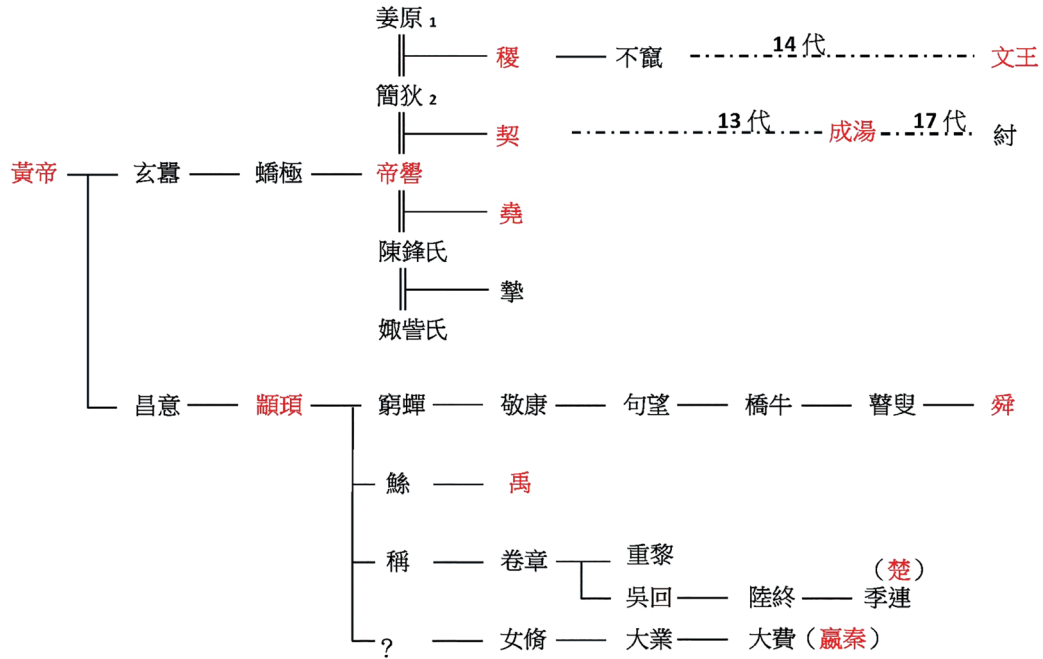
此一改造趨勢，如果有足夠的資料，應該還可以更細緻地建構蠻夷變成「中國人」的過程，至少時代比較晚近才產生改變的臺灣平埔族群，就可以提供給討論中國南方蠻夷「漢化」者參照。像湖南生蠻轉為熟蠻再變成漢人，以及政府利誘熟蠻征討生蠻的手段，清領時期的臺灣原住民都發生過。整體而言，臺灣同樣不脫離軍事征服、設官治民和文化改造的模式，但還反應經濟的剝削，我總結早期平埔族群是在剝削和壓迫中「漢化」，或「文明化」，他們也從南島語族變成漢藏語系的中國人。⁴⁷

所謂「文明」，基本上是按照征服與統治者的標準，完全符應黑社會的規則：「誰是老大，誰說了算。」征服、統治、主宰三合一者，支配平埔族群的經濟利益，判定社會的是非對錯，規範道德和美學的準則，故自十七世紀以下，兩三百年之間，平埔族群原來的衣冠、裝飾、語言、家族結構、社會組織、宗教信仰、意識形態幾乎完全改變，只零星地殘留一些痕跡。這個轉變模式，一千年，甚至還更久以來的中國南方，大概也不例外，只不知現代的中國人在史料不足的情況下，願不願意像近百年前的譚其驥或上世紀九〇年代以來的臺灣學界，能客觀地面對這個「中國化」的歷史課題？

成為中國人的過程，文化改造之外，另外一層創造的歷史也值得探究，即編織血緣聯繫，創造黃帝子孫的神話作為根源，由於政治的需要，到近代達到巔峰。茲據傳統文獻，作「黃帝族譜」圖表於下（圖六），可以看出這個神話多麼無稽。

共祖神話很早就出現，不但夏、商、周三代的始祖都同出一源，也與堯舜是一家。這個譜系的關鍵人物是五帝的第三位帝嚳，他娶四妃，個別生有一子（至少），陳鋒氏女生放勳，媯訾氏女生摯，摯先立，不善，遭罷免（史書說「禪位」），弟放勳立，是為帝堯。帝嚳次妃簡狄，生殷契，商的始祖；元妃姜原，生棄，是為后稷，周的始祖。至於夏的始祖鯀，其父顓頊；虞舜的父親瞽叟，上推五代也是顓頊，則虞、夏都出於顓頊。顓頊是黃帝之孫，帝嚳是黃帝的曾孫，那麼五帝和三代始祖都是同一家族的人。

⁴⁷ 參杜正勝，〈《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大陸雜誌》96.1-6（1998）。



圖六：黃帝族譜（作者繪製）

這份譜牒首見於《大戴禮·帝繫篇》，司馬遷寫五帝、夏、商、周的本紀都照單全收，其世代之不合理，連帶造成時間的錯亂，我討論先周歷史已經辨證。⁴⁸譬如古書說堯嫁二女給舜，按照世系，堯長舜四代，那麼舜娶的是曾祖姑婆，天下竟有這麼荒唐的故事，但中國古之聖人這麼傳述，中國人兩千年來都深信不疑。這個族譜年代最晚出的周人反而成爲帝嚳元妃的長子，反映這個世系是周人的創造，很可能是春秋時期華夏集團整合到相當程度時的作品，到近現代卻變成凝聚中國意識的重要工具。

不限於華夏，南方的楚，公羊家謂之夷狄、孟軻謂之南蠻者，在《帝繫篇》、《史記·楚世家》也都納入華夏祖先的系統。楚的始祖季連是陸終第六子，陸終父吳回，吳回的曾祖是顓頊，上兩代就是黃帝。顓頊又稱高陽，屈原自述身世的《離騷》，開口就說：「帝高陽之苗裔兮」。西方的秦原是戎狄，司馬遷《秦本紀》也把秦始皇安排做帝顓頊的苗裔，不過是母系罷了，始祖女脩吞鳥卵而生子大業，於是繁衍爲秦族，故有祖先「鳥身人言」的傳說。總之都是神話世界的事，所以始祖由顓頊再追溯到黃帝，當然也是神話。

秦、楚猶屬中國本部，本部之外的匈奴，《匈奴列傳》說先祖淳維是夏后氏之苗裔，司馬貞《史記索隱》引樂產《括地譜》補足太史公的概述：「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匈奴

⁴⁸ 杜正勝，〈關於先周歷史的新認識〉，頁 1-45。

始祖既是夏桀之子的後人，當然可以連上顓頊和黃帝。黃帝苗裔甚至遠及海外，《梁書·東夷傳》說：「倭者，自云太伯之後。」太伯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周是帝嚳和黃帝的後裔，那麼日本的倭人豈不也成了炎黃子孫？

現代的中國人就是這樣形成的，然而儒家經典和正史所見「中國人」的來源，適足以證明強調血緣種姓的民族觀是一條死路。

四、天下之中的建構

(一)「中國」與天下

上文論「原中國」引述《史記·貨殖列傳》講唐、殷、周建都的河東、河內和河南，此一晉、陝、豫三省黃河矩形拐彎地帶的三河，「在天下之中」。我們說過這是「中國」之「中」，而「中國」的取義也是作為天下中心的意思。

甲骨卜辭雖然未見「中國」一詞，卻有「四土」和「四方」，有時各別稱「南土」、「西土」，陳夢家釋「四方受禾」、「四土受年」的卜辭云：四方對大邑，四土對商；大邑和商都指大邑商，即殷商政治中心的首都。⁴⁹用西周的詞彙說，等同於王畿的「中國」。

今日所見「中國」的資料，年代最早者當推上世紀六〇年代陝西寶雞發現的周初銅器何（何）尊和《尚書·周書》〈梓材篇〉。何尊銘文記述成王五年，「王初遷宅于成周」，舉行祭典，訓誡宗小子的講話。其中提到武王既克大邑商，廷告于天曰：

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錫（乂）民。

「中國」即新營建的成周，周統治者遷居於此，以治理人民。成周是西土周人代殷商為天下共主後，統治東方的都城，因為不論最早的周原或文武二王遷建的豐、鎬，都離黃淮平原的諸侯國太遠，不利於掌控大東方。

近人討論「中國」一詞何時出現，往往引證〈何尊〉，以為西周早期中國已經存在，殊不知「國」的本義指城，和包含一大片領域的「邦」不同。⁵⁰正如《大雅·民勞》所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與「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成對，毛《傳》說：「中國，京師也。」此正如點和面的差別，所以論今天中國的起源和〈何尊〉的「中國」是不相干的，只要考察西周時期的用語就明白了。

⁴⁹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頁319。

⁵⁰ 參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1992），頁450-453。

不過，「中國」也指周王直接統治的領域，即王畿。和何尊年代相近的《周書》〈梓材篇〉，記周公旦對康叔封的講話，他說：先王（指文王）「既勤用明德」，得到輔佐，「庶邦享作，兄弟方來。」「邦」指周同盟的諸侯，「方」則代表遙遠的國家或異族。方和邦層次分明，接著又說「皇天既付中國民越（與）厥疆土于先王」，這個「中國」又是另一層次，指周王直接統治區。所以構成中國——庶邦——兄弟方（友善外族）的次序。皇天付予文王的「中國」也就是周邦，如西周後期〈大克鼎〉銘曰：「保辭（父）周邦，峻尹四方」，和「四方」相對。西周晚年的詩《大雅·桑柔》曰：「降此蝥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哀痛飛蝗吃盡農作物，導致飢荒，「中國」的範圍當然不限於京城而已。可能是西周早年的《大雅·蕩篇》，述文王數說殷紂之惡曰：

女炁炁于中國，斂怨以爲德；內爨于中國，覃及鬼方。

炁炁，毛《傳》云：彭亨也（似臺語的「膨風」）；鄭《箋》：自矜氣健之貌，即今天說的目空一切，得意洋洋之狀。爨，毛《傳》：怒也。紂王招怨和激怒的「中國」也應是商王畿的人民，相對於甲骨文辭的「四方」。

《詩》《書》和西周金文常見「四國」，《邶風·破斧》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皇，毛《傳》云：匡也。四國者，東土的天下城邦，周公征伐過後都匡正了，即不敢再反抗周。周公東征，西歸宗周鎬京，召集天下諸侯訓話，開口就說：「告爾四國多方」（《周書·多方》）云云，「四國」「多方」連言。《曹風·下泉》是讚美邠伯勤王的詩，末章云：「四國有王，邠伯勞之」，「四國」與前三章的「周京」「京師」相對，四國即指奉周王爲共主的華夏諸邦。其他如《小雅》〈十月之交〉的「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雨無正〉的「斬伐四國，昊天疾威」；〈青蠅〉的「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這些「四國」都是此義。〈毛公鼎〉宣王冊命毛公曆，「用印（綏也）邵（紹）皇天，綢繆大（天）命，康能四或（國），俗（欲）我弗乍（作）先王憂」，勉勵毛公輔佐他領導諸侯，以保天命，以免先王在天上擔憂。〈猷鐘〉銘末，周厲王祝禱辭云，祈求「猷（厲王自稱）其萬年，峻（峻）保四國」，即保有天下共主之位。

「四國」往往與「四方」並稱，《大雅·崧高》，周宣王封申伯於謝，勗勉申伯作爲周的屏障（「維周之翰」），並護持天下諸邦，詩人乃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垣）」。四國、四方之連言與上引《周書·多方》的「四國多方」相同。

周宣王期勉毛公輔佐他「康能四國」之外，更多的職責是「辭（父）我邦我家內外」，「弘我邦我家」，預防王只憑一人之智而「喪我或（國）」（「無唯正聞，弘其唯王智，迺唯是喪我或。」）我家、我邦、四國，一層層往外擴充。

《詩》《書》和金文也常見「四方」，《大雅》〈大明〉曰：「天位（立）殷適（敵），使不挾四方」，謂上天使殷不達於諸侯邦國。相反的，上天使周自大王、王季「受祿

無喪，奄有四方」，助文王攻克崇國，「四方以無拂（違也）」；〈〈皇矣〉〉〈下武〉曰：「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文王有聲〉曰：「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到文王時，天下諸侯多站在周這邊了。

武王伐紂，牧野誓師，《周書》〈牧誓〉數落紂王的罪行，有一項：「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諸侯邦國的罪犯逃到王畿，商王反而重用。〈金縢〉保存周公祈禱祖先願代武王而死的祝詞，說他比武王「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讓他去服事祖先，武王留在人間，才能「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大孟鼎〉追述武王功業，也稱贊他「匍有（敷佑）四方，峻正厥民。」可見「四方」和「四國」一樣，都是以共主的立場對天下諸侯而言，和周王直接統治的周邦、王畿不同。

在五服制之內，只要「來貢」、「來王」者，大概都屬於「四方」。〈虢季子白盤〉曰：「丕顯子白壯武，經維四方，搏（搏）伐厥鞫于洛之陽」，厥允（獫狁）在虢季子白「經維」的範圍內。〈兮甲盤〉也說：「王令甲政（征）辭（治）成周四方賁（積），至于南淮尸（夷）」，兮甲到成周徵收四方賦稅，及於南淮夷。〈晉公盃〉追述「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百蠻，廣辭（治）四方，至于大庭。」四方包含百蠻。不過，「四國」卻未見涵蓋蠻夷戎狄的詞例；相反的，《大雅·蕩篇》說紂王「內燬于中國，覃（延也）及鬼方」，商紂招怒的包括諸邦的「中國」和鬼方。所以「四方」和「四國」雖然往往通用，卻又有別，按祭公謀父的講法，「四國」只指侯服、賓服，而「四方」則連要服和荒服都包含在內。

總之，西周的詞彙，「中國」指王都，也指王畿，服從於周共主的諸侯邦國則稱「四國」。「四國」依其相對於周都的方位，而分東國、南國、北國，皆指該方位的諸侯。西周「四國」等同於春秋的「華夏」、「諸夏」、「諸華」，不過西周沒有這些說法，也很少說「中國」，以「中國」代替「華夏」是戰國的用法。「四國」也可以說「四方」或「多方」，但「四方」除諸侯外還可以涵蓋蠻夷戎狄，「四國」沒有如此的廣義，故對不臣服的蠻夷有「不廷方」之稱，不是「不廷國」。至於「天下」，包羅所有的國家，是到戰國才常見的語彙。

（二）土地之中

很多民族的自稱，意涵多是「人」，意味只有我族才是人，他族不是；於是衍伸出我族居處之所在是土地之中心，他族都在邊緣。大約西元七〇〇年，阿可夫主教（Bishop Arculf）訪問耶路撒冷，見城中心聳立一高柱，得知這是地球的中心。貝理丹尼的《聖經地理》認為此乃古老流傳之說，因為自古以來，耶路撒冷又稱姆法羅斯（Omphalos），意即「地臍」，或中心，世界的次序由這裡算起，陸續傳送到「住在地

盡邊的人。」⁵¹據貝理丹尼說，希臘的德爾菲（Delphi）及阿拉伯的麥加（Makkah）都有同樣的概念；中國當然也有，但不是他說的北京。

雖然同有「地臍」或「土地中心」的概念和思維，因為歷史傳統不同，文化憑藉與語言表達自然有異。中國很早就產生天圓地方的觀念，土地的中心謂之「地中」，古人試圖尋找合乎自然的合理解釋，並且發展出一套頗為複雜的技藝，並且付諸實行。

關於「地中」的記錄與論述始見於戰國時代，《周禮·大司徒》曰：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影，下同），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土圭，度量長度的玉圭形儀器，《考工記·玉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度也）地。」致日即〈大司徒〉的測量日影，鄭司農說，在植圭之下舖一條八尺的影表，以度量投射在地上的日影。這些尺寸都按漢尺計算，故土圭約合 35 公分，影表 184 公分。中國地處北半球，中原約在北緯 34 至 35 度左右，夏天太陽北移，圭影短，冬天太陽南移，圭影長。⁵²《周禮·土方氏》云：「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鄭玄注曰：「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後漢書·律曆志》同，其他資料只有微小的差異。⁵³

〈大司徒〉又曰：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一尺五寸的土圭夏至之日影長度亦一尺五寸，要在特定地點才會產生這種現象，此地稱作「地中」。鄭司農說，只有潁川陽城才符合此條件，據說西周初的周公旦找到陽城來，並且植立土圭以測日影，世人謂之周公測景臺（圖七）。六世紀初酈道元的《水經注·潁水》記載陽城故城南有「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爾後圭可能已毀，唯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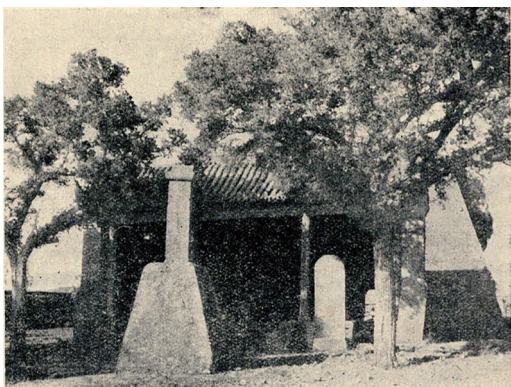
⁵¹ 貝理丹尼著，呂榮輝譯，《聖經地理》（Denis Baly, *The Geography of the Bible*, 1974）（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7），頁 3；關於 Bishop Arculf 的故事引自 Thomas Wright 編的 *Early Travels in Palestine* (London: H. G. Bohn, 1948)。按，Omphalos，呂榮輝譯作「意即地臍」，據《舊約·士師記》9:37 英譯作 The center of the land，即是「地中」。

⁵² 關於〈大司徒〉的「日南」、「日北」，不能從字面解。按鄭玄注云：「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日南，夏至影最短，正如賈公彥所說：「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以其在上臨下，故最短也。」（《考工記·匠人》疏）太陽在土圭之上，就是往北半球移動到極限，鄭玄說的「地於日為近南也。」日北則是太陽南移，「地於日為近北也。」另外關於〈大司徒〉的「日東」「日西」，應該是以土圭測日出日落，《考工記·匠人》曰：「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規是晷儀，度算時辰，而〈大司徒〉並言之，或即〈匠人〉「晝參諸日中之景」的意思。「景夕」「景朝」，鄭司農說：「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之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午後太陽傾側，景投到立表處謂之「景夕」，如未到中午而投向立表處則是「景朝」。如何「中」，不可解。鄭玄解釋「東於土圭為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圭為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地於日的距離當指太陽在東西半弦形天空的位置。

⁵³ 參董作賓，《周公測景臺調查報告》（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頁 30-32。

猶存，故西元六七九年高宗「命太常博士姚玄於陽城測景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景尺有五寸，正同古法。」⁵⁴夏至一尺五寸的圭影長度在正午時測量才算數。漢唐相傳的周公測景臺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鎮，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董作賓曾前往調查，撰寫報告，對中國土圭測影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思維考證得相當透徹。

據《後漢書·律曆志下》，東漢天文官在二十四節氣的定點日記錄土圭儀表所測得的晷景，冬至丈三尺，小寒丈二尺三寸，大寒丈一尺，依次遞減，到夏至這天影長尺五寸，爾後又逐次遞增，冬至前的大雪丈二尺五寸。這些數據應該是在陽城測量的。以陽城作中心，後世不同朝代選擇南北不同地點實測日影長度，證實冬夏二至南北的晷差皆不相同，各地晷影差度與地理距離，鄭玄概括說：「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大司徒〉注）唐代雖對鄭玄有所修正，但兩者存在的關係則無異議。⁵⁵所以根據各地日晷與陽城的差度可以推算距離陽城的里程，而確定其地理位置；周公測景臺可以說是經緯度地圖出現以前，中國傳統測繪地圖的基準點。



圖七：周公測景臺
（董作賓，《周公測景臺調查報告》，圖六、七）

〈大司徒〉又深進一層論述「地中」的文化意義：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在「地中」建都，「地中」成爲千里王畿的中心，也是天下的中心。這是一個富含神秘力量的聖地，不只具有政治意義而已；天地在這裡所會合，四時在這裡交接，風雨在這裡會聚，陰陽也在這裡調和，故百物得以豐厚安頓，自然成爲最適合建都的地方。

「中國」範圍內，符合圭長一尺五寸而夏至當午日影長度也是一尺五寸的地方，只有陽城，所以陽城便是「地中」，便是「中國」之中心，古來傳說也顯示陽城是古代聖王的首都。

⁵⁴ 《嵩高志》引《通典》，此據董作賓，《周公測景臺調查報告》，頁 27-28。

⁵⁵ 董作賓，《周公測景臺調查報告》，頁 30-37。

孟子說：「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孟子·萬章篇》《竹書紀年》曰：「禹居陽城」，或作「禹都陽城」，居、都意近。唐朝顏師古引述另一傳說云，「堯曾遊于陽城」，《漢書·楊雄傳》注）到百二十八歲而崩，葬於此。《莊子·逍遙遊》成玄英疏）陽城座落在嵩山之南和箕山之北，潁水流過。孟子又講禹死後，「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亦在陽城。這裡不只有儒家古聖王的傳說，也和道家高士密切牽連。《莊子·讓王篇》說，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晉皇甫謐的《高士傳》接續說了許由洗耳於潁水濱，其友巢父牽犢不飲其水的故事。總之，陽城是一個神聖又高潔的地方，酈道元總括這些故事，曰：「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啓並于此，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墓焉。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又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是漢潁川太守所立。」（《水經注·潁水》）不論隱遁的道家或經世的儒家人物以及故事，長年以來多從這個相信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地中」流傳到各地。

陽城測景臺既有周公旦「度景求地中」的傳說，（〈大司徒〉賈公彥疏）當是歷來的聖地，周武王滅殷之後，曾在這裡行大封禮，以告示四方諸侯，並且祭祀上帝。當時一件作器天亡簋（一稱大豐簋）銘文就是說這件事。銘曰：

王又（有）大豐（封），王凡（風，諷告也）三（三之省文）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王不（丕）顯考文王，事喜（熹）上帝。文王監才（在）上，不（丕）顯王乍（作）省，不（丕）肆王乍（作）麋（賡），不（丕）克三（乞，訖也）衣（殷）祀。⁵⁶

武王不但在天室「殷祀其父文王，柴燎上帝」，臨終時特別召來周公交待後事，叮嚀營建新都不能遠離「天室」。《逸周書·度邑篇》曰：

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

我既完成皇天賜予統有天下的命，登用天民以定天保，卜宅當依近天室。（參用朱右曾解釋⁵⁷）但建都工程尚未實行，武王已經病危，於是將傳位給周公，⁵⁸也託付卜宅建都的重任。這番話周公聽得惶恐泣涕。武王繼續交待說：

⁵⁶ 〈天亡簋〉的疏解，本文擇取諸家解說，或許比較能復原歷史情境。「王有大豐（封），王風（諷）四方」，封，諷，取郭沫若說。「丕克乞（訖）衣（殷）祀」，取陳夢家說，乞讀為訖，終止殷商的天命。「衣（殷）祀于王丕顯考文王」，合為一句，殷祀者豐盛之祭祀也，《公羊傳》文公二年：「五年而再殷祭。」「丕顯王作省，丕肆王作賡」，用白川靜說。

⁵⁷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⁵⁸ 《逸周書·度邑篇》王曰：「昔皇祖底于今，勳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祖先功業交付在我身上。）「肆若農服田，饑以望穫，予有不顯，朕卑（俾）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耕種都希望有收成，但我能力不夠，不能使皇祖配享上帝。）「汝幼子庚（賡）厥心，庶乃來，班朕大環。茲于有虞意，乃懷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下，朕不賓在高祖，維天不嘉，于降來省（省），汝其可（何）瘳于茲？」（你繼續用心，叫你來，頒賜給你我的大玉環，作為信物。在這裡若再考慮，若想到妻、子，既不能上追祖德，也不會下合民意，那我就回不到高祖身邊了。老天也會不高興，降下災難，你還能幸免嗎？）「乃今我兄弟相

旦，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室，其有憲命，求茲無遠。天有求繹，相我不難。

武王深思要長期平定殷人，只有倚靠天室，「以習憲令，其地，即于此求之，勿遠。」（朱右曾釋）新都城所在不能離天室太遠，他說：

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過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無遠天室，其名茲曰度邑。

洛水入黃河和伊水入洛之處，不適合建都，不可重蹈夏代經常遷徙的覆轍。但有一個地方，南望三塗山，（嵩縣西南）北望霍山腳下，⁵⁹回頭可以看到黃河，坐著側視延至伊、洛，而且離天室不遠，可以名叫「度邑」。五年後，周公乃在澗水東、灋水西的平地營建新邑，《尚書·洛誥》這個新邑名為成周，即今之洛陽。

天室當指具有神秘性和神聖性的「地中」陽城，不過陽城在嵩山山脈之南，對當時東土、西土的諸侯比較偏僻，不方便集會。武王籌思建都連言三次，不是說都城要「依」之，就是說「無遠」，離陽城不遠的洛邑正好可以滿足現實性和象徵性的要求。周公遂在那裡建都，又在陽城立了測景臺。

春秋以前，中國政治舞臺主要在黃淮平原，以中嶽嵩山之陽的陽城作為地理中心，猶或可說，戰國以下，「中國」範圍擴大，知見日廣，尤其西元前二世紀後期漢通中亞、也知有西亞、南亞之後，知道整個中國偏處在東方，古之「地中」便難自圓其說。地理學專著《水經》的作者想解決這個地理中心的問題，故開篇就說：

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陽城北邊是嵩山，嵩高即指陽城，《水經》把古典的「地中」往西移了五萬里，新世界觀確定崑崙山才是土地之中。

酈道元《水經注》補充說：「《禹本紀》與此同。」《禹本紀》謂河出崑崙，司馬遷知道此書，但張騫到過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太史公不相信《禹本紀》黃河源出崑崙的說法。酈道元又考證：「自宗周（按當作「成周」）灋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有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成周依近陽城，果如《水經》所說，崑崙為「地之中」，那麼「地中」就得西移七萬七千四百里了。

後，我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今天我們兄弟先後繼承，我已經占卜過，就是眾建，不是直系單傳。）「叔旦恐，泣涕共（拱）手。」（周公旦聽了非常惶恐、淚流滿面、拱手在側。）

⁵⁹ 北望的嶽，《史記·周本紀》司馬貞《索隱》推測可能是黃河北岸的太行山，張守節《正義》據《括地志》以為太行山和恆山，但又說「晉州霍山一名太岳，在洛西北，恆山在洛東北。」按《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九州最主要的冀州，聖山是霍山。《史記·趙世家》曰：「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又講了霍泰山山陽侯天使預示趙武靈王的神話。故我以為武王說的「嶽」是指霍太山。

一個地方會成為「地中」，神秘性之外，神聖性是不可或缺的。上面舉證的耶路撒冷，《舊約·以賽亞書》說，耶和華殿的山超乎諸山，高過萬嶺，多國之民前往，「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2:3)在中國文化裡，「諸仙居之」的崑崙山即使多麼神秘，卻缺乏儒家正統的神聖。

誠如酈道元所說，作為地中的崑崙，「道阻且長，經記緜邈（脫也）……非所詳究。」里程不是重點，主要關鍵在於崑崙山晚到戰國才出現於中國，其神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玉也）」，《山海經·西山經》而且穴處，《山海經·大荒西經》對務實的中國人來說，絕難與古代聖王並列。雖然後來西王母演化成美婦人，與周穆王互相酬唱，傾訴依依不捨的戀情，⁶⁰即使升格為仙，距離中國人崇敬的聖王仍然很遠。總之，崑崙作為「地中」只是中國人知道天地之廣以後產生的新穎異說，沒在中國社會生根；要成為土地之中，單憑物理性的地理中心還不夠，基本要素離不開政治中心這項元素，尤其是具有神聖性的政治中心。

後世中國接觸和見聞的世界遠遠超過周代，「地中」陽城在現實政治中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中原」的概念卻一直流傳到今天。

（三）資源匯聚帝都

中國進入城邦時代，歷史舞臺從過去分散各地的「滿天星斗」轉而聚集在以中原為中心的北方；不只三代，整個中國傳統時期，前一千多年舞臺在黃河中、下流域，後八百年移至燕山南沿，也在北方。

城邦時代的考古資料顯示北方青銅兵器比其他地區先進，人力資源多聚集於北方的城市，經濟也比較發展，集合這些條件，統治政權（城邦）於是建立，意識形態（禮制）隨之塑造，北方遂比中國其他地區先進。⁶¹

最高權力所在，資源必然匯之，帝都遂亦成為經濟重心，城邦時代「原中國」唐虞和夏商周建都的三河即是。此一歷史規律司馬遷早已指明。《史記·貨殖列傳》曰：「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人民曉得累積資本，加上辛勤幹練，從「天下之中」走向四方經營貿易。河東的楊、平陽，北賈種（蔚州）、代（代州）；河內的溫軹，西賈上黨（澤州、潞州），北賈趙（洛州）、中山（定州）；稍北的邯鄲，則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河南的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以三河為中心投射出去的貿易圈涵蓋戰國以前的中國。

⁶⁰ 《穆天子傳》卷三：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丘際（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諫（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夏民。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群，於（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

⁶¹ 參杜正勝，〈史學之空間思維的雜想〉，劉翠溶主編，《中國歷史的再思考——許倬雲院士八十五歲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7-33。

河東平陽這條貿易路線末端到山西北部的種、代，其「地邊胡，數被寇」，民性彪悍，「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而由於迫近外族，「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士卒消費帶動商機，當地人既然健悍鬥狠，不屑經商，反而讓楊與平陽的商賈容易來做生意，得之所欲。

河內溫、軹出發的貿易路線，往北至趙和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自商代以來養成的奢靡風氣甚盛，多靠投機牟利過日子。趙地男子相聚遊戲，悲歌忼慷，殺人搶劫，或盜墓、非法礦冶，作奇技淫巧之奢侈品。女子寧當倡優，鳴琴鼓瑟，穿高跟鞋（跣屣），游媚貴人富戶，爲人姬妾，遍於諸侯。史遷對趙地和中山侈靡淫風的記述，顯示都會商業經濟發達，而高級消費也達到了極致。

另外邯鄲一路，北端的燕、涿和種、代同樣近胡，燕趙亦多慷慨之士，南抵鄭、衛，「俗與趙相類」，衛風亦「好氣任俠」。游俠刺客的溫床多在都會，但這裡也是商貿消費興盛之地。燕距離渤海、碣石不遠，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與趙、代風俗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商貿興旺，正如蘇秦遊說燕文侯所說，「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戰國策·燕一》）燕長城之北乃烏桓、夫餘，東連穢貉、朝鮮、真番（潘），商賈來收購當地特產銷往內地，易致厚利。

河南對外的貿易從洛陽出發，東至齊、魯，著名政治家管仲就是洛陽附近的潁上人，到齊國做生意而從政。位於泰山和渤海間的齊有山海之利，並且「膏壤千里」，人民生活富庶，「多文綵衣帛魚鹽。」蘇代說過：「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戰國策·燕》）齊人把不純的白繒染成紫色，可以十倍之價出售。不合格商品加工後，反而賣出高價錢，可見齊國紡織工藝之精與商貿之發達。〈貨殖列傳〉說：臨淄「其中具五民」，五民，如淳釋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其實是經貿興盛的都會，吸納四面八方的外來人口，故多游俠，「勇於持刺，多劫人。」臨淄有一特點，「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所以聚集許多游士。至於鄒、魯雖說有周公遺風，好儒備禮，「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事實上，任何儒風鼎盛之鄉，不可能存養那麼多道貌岸然、口誦詩書而不事生產的人口，儒學大本營的鄒魯人做起生意也很在行，他們的勢利甚至超過大家常批評的洛陽人。

洛陽成周的人以好經商著稱，其貿易路線是南賈梁、楚。梁、宋鄰近的商業中心的定陶、睢陽，范蠡去越，浮海出齊，先則「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累積財富數十萬，然後「懷其重寶」，止于定陶。

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

果然靠著經營長才，「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做以有易無、買賤賣貴的投機生意，「致貲累巨萬。」（《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楚則有「雲夢之饒」，富於天然資源，且「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貿易之盛，歷來聞名。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詳述從「三河」往外投射的商貿網路，雖是戰國現象，但地理優勢自古已然；而且古代這一地區自然環境尚未過度開發，黃土地反而更適合於當時的農耕技術。^⑫長期作為政治中心，又具備豐厚的經濟實力，即使到戰國時代，強國都在中原的周邊，但歷史傳統留下的底子仍然持續發揮作用。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316 BC），太史公的先祖司馬錯與張儀在秦王面前爭論伐韓或伐蜀孰利，張儀主張伐韓以臨二周，「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才是「王業」，若反而「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不以為然，一是蜀容易攻克，「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再則蜀地「利盡西海」，往南發展通印度的遠程貿易，蜀可以為「地小民貧」的秦國打好經濟基礎，王業自然易成。惠王從其議，遂起兵平定蜀，控制天府之國的資源，於是「秦益強富厚，輕諸侯。」（《戰國策·秦一》）司馬錯的敏銳觀察，三百多年後班固撰寫的〈地理志〉完全可以證實。^⑬

漢五年（202 BC），劉邦打敗項羽，稱帝，群臣皆東（周之東土）人，欲都洛陽，只有劉敬從社會基礎與地理形勝分析，力主建都關中。關中位於黃土高原上，俯瞰黃土平原的東方，如地質學家所說的第二階梯和第一階梯之差，勢若高屋建瓴。劉敬說，這裡建都，如與人鬥，可「搯其亢（喉嚨也），拊其背」；如果山東發生動亂，仍可保有秦之故地，俗話所謂「進可攻，退可守」也。他還特別強調秦「甚美膏腴之地，所謂天府者也。」古代關中自然環境尚未嚴重破壞，《漢書·地理志下》故云：「有鄠、杜竹林，南山（秦嶺）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禹貢〉概括九州田賦等第，雍州土壤肥沃，「厥田為上上」，名列第一。

中國歷史上的兩大盛世漢與唐，文化以周朝為典範，政制繼承兼併六國的嬴秦，都在關中建都。這幾個朝代的定都雖各有其歷史情境，不過關中農作生產力之高與自然資源之富，應該是決定性的經濟基礎，遂成為中國帝制早期理想的都城所在。

帝都參養大批官僚、皇室服務人員與營建宮殿、離宮別館與皇陵所需的勞動力，商人，還有因罪沒入的官奴婢，以及龐大的軍隊。人流也是錢流，人口聚集的帝都商賈隨之，許多尋求機會的人也跟著來；尤其秦漢亦常政策性移民，為政治需要召來大批人口。如秦始皇統一天下，即「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史記·秦始皇本紀》）漢高帝九年徙齊楚大族五姓於關中，（《漢書·高帝紀》）武帝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又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陽。（《漢書·武帝紀》）這些都是官方記錄瑩瑩大端者，全國各地的富豪以及社會有影響力的人，皇帝都把他們調集在腳

^⑫ 關於黃土高原生態變化的歷史研究最深入者當數史念海，參所著《黃土高原歷史地理研究》（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1），論文多收入數種《河山集》。至於黃土地經過灌溉便成為沃壤，增加生產量，首發於冀朝鼎（Ch'ao-Ting Chi,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而多方面的論述則參何炳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69）。

^⑬ 《漢書·地理志下》曰：「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僊僮，西近邛、苻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

下，好控制，正如《三輔黃圖》所說：「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于諸陵，強本弱末，以制天下。」林林總總的來源，使帝都的糧食需求自然大量增加。

關中人口聚增，不得不漕運外地糧食。《史記·平準書》說，漢高帝「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後來不足，武帝元光六年（129 BC）乃穿漕渠通渭以抵長安，《漢書·武帝紀》河東太守番係說：「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漢書·溝洫志》）這條從東到西的漕路走黃河，必需經過三門峽底柱之險，漕運敗亡甚多。十年後（119 BC）黃河漕糧增加到四百萬石，尚不足，新置的官府有許多服役的徒奴婢（受刑人當奴婢），官給不足，還需要自糶。《史記·平準書》不到十年，「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同上）可見京師及其周邊地帶人口增加之速。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疏云：「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漢書·食貨志》四百萬石應是常態。

西漢的漕運史足以證明政治權力中心即是資源彙集之地。關中糧食壓力如此沈重，漢光武帝不得不離開關中，建都洛陽，建武五年（29）令張純「將潁川突騎，安集荊、徐、揚部，督委輸。」（《後漢書·張純傳》）靠兵力保護，讓長江中下游的糧食得以安全運抵洛陽。首先多靠驢車轉運，稍後穿鑿陽渠引洛水為漕，（同上）而從河內溫縣轉運的糧食亦改採水運。《後漢書·王霸傳》

帝都不論在長安或洛陽，都要調集東方產出的米穀，兩漢資源之匯聚，顯然都是從東方往西轉運的。爾後大約四百年的紛亂和分裂，統一的隋朝仍定都關中，前後開鑿通濟渠、永濟渠與山陽瀆，以連接黃河、淮河、長江到錢塘江。

李唐建都長安，沿用這幾條運河，漕運路線從揚州經斗門，走淮水，轉汴河到河口，再到洛陽、長安。形勢上糧食之運輸，從由東而西轉為東南往西北，因為北方地力耗盡，而長江中下游相對開發晚，隋唐時期生產力已超過黃河流域的「山東」。唐高祖即位之初，命李襲譽運劍南之米以實京師，李靖運江淮之米以實雒陽。⁶⁴《新唐書·食貨志》說，「唐都長安，關中所出不足，故常轉漕東南之粟。」江淮漕租米先至洛陽儲存於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需經三門峽，「多風波覆溺之患」，大抵只有八成能抵達京師而已，武則天不得不常就食於東都。

安史亂後，代宗以劉晏專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使，總全國度支事；德宗以杜佑為江淮水陸運使，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同上〈食貨志〉）專職的轉運使成為財政大臣，唐中葉以後其職事著重水陸轉運，反映江南的生產為國家命脈所繫。汴州即是這條輸送糧食的中繼站，居於樞紐的地位，那麼趙匡胤選在四戰之地的汴梁建都，也就可以理解了。

⁶⁴ 《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卷一五六引《冊府元龜》。

元朝開通的大運河把南方資源匯聚到大都，明清兩代繼之，富庶的江南不但供輸物質而且提供人才，送往北京。兩漢從東到西，隋唐從東南往西北，宋元明清則由南而北，資源輸送的管道隨著帝都而轉移，政治支配經濟的歷史軌跡昭然若揭。

(四) 以帝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

西周詩歌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此乃「勞於王事不得養父母」者憤慨之語，（《孟子·萬章上》）不是周王的土地涵蓋全天下，不過，王為天下之中心的概念，則亦可以從這些詩句顯露出來。

上文說過，「天下」比「四國」多了蠻夷戎狄所屬的要服、荒服，包含中國政府直接統治、勢力範圍及其以外的地區。按照城邦時代五服制的劃分，「天下」大約近似現代人說的「世界」，不過近代之前，中國歷史上少數時期，如戰國或宋與西夏、遼、金之外，中國人缺乏列國的平等觀念，所以講傳統中國的世界秩序還是用「天下」的概念為宜。

由於周穆王欲攻打犬戎，祭公謀父反對，才講述五服制的天下秩序。祭公說，要服之蠻夷對周的職事是歲貢，荒服之戎狄更輕，終世才來覲見一次；若不盡職，周既不會征，也不會伐，只予以口頭譴責或發文曉諭而已。如果布令陳辭他們又不來，周王要自我檢討，「增修於德」，不可勞師動眾，「勤民於遠」。穆王拒諫，硬要把理當「來王」之職的犬戎硬改入四時來享的賓服，不享則征討。據說穆王這次遠征只「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換來的後果則「自是荒服者不至。」狼與鹿，竟與後來北方游牧民族的始祖傳說巧合。

按照祭公謀父的說法，第四、第五圈的要服和荒服不屬華夏（春秋概念的「華夏」或戰國概念的「中國」），中國政府既不干預，也不會到那麼荒遠的地方。〈禹貢〉的說法近似，唯用來處分罪犯，要服之遠處「蔡」，荒服之遠處「流」。《孔氏傳》：「蔡，法也」，施以罰，當如蔡沈《集傳》所說：「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此解有典據，《左傳》魯國大史克述說古昔帝鴻氏、少皞氏、顓頊氏和緡雲氏的不才子四凶的種種罪行，舜執政後遂「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文公十八年）華夏族只有窮凶惡極者才會被政府放逐到四裔之地，正常人是不能去的。

然而歷史的現實，對於力所不及的遙遠地區，中國幾千年來的一貫態度，大抵不出周穆王和祭公謀父所代表的兩種模式。一主積極進取，可攻伐則攻伐，能占有則占有，荒服變成勢力範圍的賓服，或者直接統治的甸服，歷代所謂大有為之君，如秦皇、漢武即是這類人物。另一種鑑於實際的困難，深怕代價太高，往往主張維持現狀，中國只要受到尊崇，保有「老大哥」的面子，何必攪得民窮財盡，怨聲四起？誠

如班固分析漢朝大臣對匈奴的態度，「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漢書·匈奴傳》）事實上「穆王模式」雖開疆拓土，卻用人民的生命和財富換來彪炳的帝業；而「祭公模式」既替帝王考慮到政權的穩定，又博得為民請命的美名，還有「修文德以來遠人」的功業，連大有為的獨裁者也不好斷然排斥。不過，說歸說，做歸做，「祭公」碰上「穆王」，歷史則是寧戰勿和。

五服制的體系，蠻夷戎狄對周天子的職事輕而不苛，現實上固然是管控不到，思想上祭公謀父只以「先王耀德不觀兵」來勸穆王，並不說明這些異族何以有此「優待」？到了漢朝的班固提出一套論述，《漢書·匈奴傳》〈贊〉曰：

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壅）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

一言以蔽之，蠻夷戎狄的地域不是中國人之居地，蠻夷戎狄猶夠不上「人」，不能平等與中國立約結盟，也不值得攻伐。

總之，中國人認為夷狄雖具人形，秉性則如禽獸，這種頑固的種族論春秋戰國時代早已形成。西元前六六一年狄人伐邢，管仲建議齊桓公救邢，開宗明義就是：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左傳》閔公元年）

約百年之後，《國語》記載晉悼公欲伐戎以開拓疆土，謂群臣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貪財貨，故易攻克。魏絳受山戎無終國之賄，藉楚威脅華夏的陳國而勸止悼公，他的理由是：

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晉語七》）

獲戎狄猶如「得獸」，失去陳國卻是「失人」，不划算。華夏與戎狄就像人與獸的對比，此一記事，《左傳》也提到魏絳「戎，禽獸也」的論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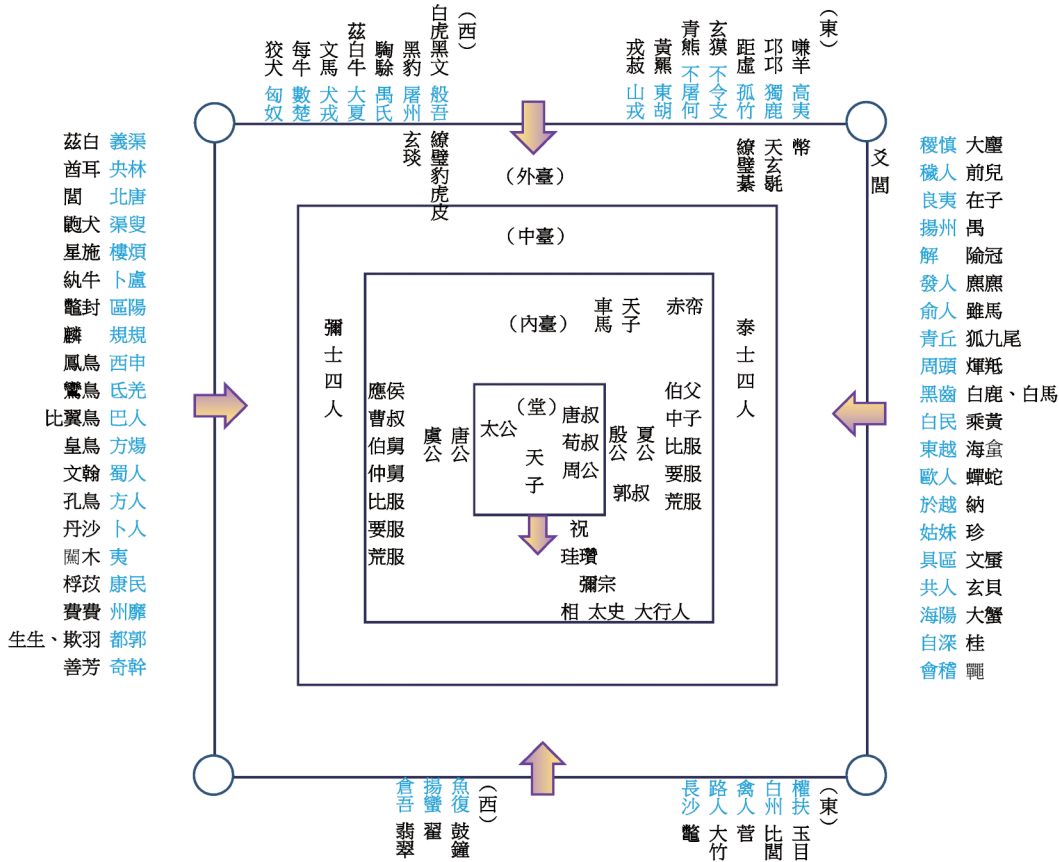
蠻夷戎狄在中國人的思維和論述中，主戰者說是「豺狼」，主和者同樣也說是「禽獸」，和戰取決於當時的政治情境，但他們對外族的定見則沒有不同。這種對待「非我族類」的思維模式，秦漢以下幾乎鮮有例外，多在不同的場合，給外國異族貼上古典的標籤，這是中國人長期對待北方民族的一貫態度，主要原因之一恐怕是「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地可耕、民可臣的話，早就直接統治，編戶齊民化了。軍事既無法徹底征服，土地不適農耕，故難設官治民，班固於是結論說：「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班固是否把祭公謀父「讓不貢、告不王」的語意說得直白了呢？

在中國眼中，對這些野蠻外族施以教化，讓他們變成中國人，簡直是給他們恩典呢！因此，遠方異族只配來朝貢，所謂「王會」或「職貢」就是這樣產生的。

孟子述說三代稅賦，「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孟子·滕文公上》）夏代的貢法已不可考，倒是〈禹貢〉認為九州要貢其特產，東方的兗州平野，貢漆絲及有花文的絲織品（織文）；青州近海，貢鹽、海物與葛布（絺），泰山地區則貢鉛、松、怪石；徐州送來五色土、顏色艷麗的羽毛（夏翟），嶧山的孤桐，泗濱的磬石，淮水蚌珠與魚，以及玄色、黑白相間及白色的絲織品。南方的揚州貢織貝、橘柚和青銅作坊不可或缺的錫料；荊州提供羽、毛、齒（如象牙）、革，稀有金屬，椿、柘、檜等木材，礪、砥、矸等粗細不等的石材，還有朱砂。中原的豫州貢漆、麻（枲）、絺、紵（麻之一種）、繒（織）絮（纊）和磨磬之石（磬錯）。西南方梁州貢上等黃金（璆）、鐵、銀、鋼鐵（鏐）等金屬，矸與磬的石材，和熊、羆、狐、狸的皮毛及織氈。西方雍州貢美玉（球）、麗石（琳）、珠（琅玕），也有織氈。正北冀州可能是帝都所在，不必貢獻。如果兩周各地諸侯對天子或霸主有所貢，奉獻當地特產應該是很合理的。

〈禹貢〉所述是華夏或中國圈內的貢品，另外《周禮·大行人》九服的前六服，即九州，除王畿不貢，其他五服分別進貢禮物，有嬪物、器物、服物、材物、貨物等名目。嬪物，鄭司農云：婦人所為物，鄭玄云：絲枲也。器物，尊彝禮器；服物，玄纁絺纊之禮服；材物，珠、象（牙）、玉、石、木、金、革、羽之八材；貨物，即龜貝。（〈大行人〉注）〈大行人〉的歸納太過刻板，不如〈禹貢〉切乎實情。至於九州之外的三服，如〈大行人〉所說：「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贄）」。贄者見面的禮物，文本沒有條列，但我們可以從《逸周書·王會篇》獲得一些想像。九州是華夏或中國的「我群」，上貢的特產都是王室貴族生活日用和禮器儀物的原料，其外之「他群」的貢物則稀奇怪異，為中土所罕見。

西周成王有成周之會，據《逸周書·王會篇》所述，王庭大臣和外朝諸侯陪同成王召見遠方的外族，都是蠻夷戎狄。周人在成周城外空曠之地築壇，堆壘內、中、外三重土臺，內臺起堂，作為最高的第四層，天子立於堂上，南向，左邊唐叔、荀叔、周公，右邊太公望，都是朝中重臣。其次，堂下右立唐公（堯之後）、虞公（舜之後），左立殷公、夏公，以示對聖王和前朝的尊重。唐堯和二代後裔之外才是內臺，西面自北而南依次站立應侯、曹叔、伯舅、仲舅和比、要、荒三服諸侯。孔晁注：「此服名因于殷，非周制」，特別提醒這裡的「要服」「荒服」不是五服制所講的四裔。內臺東面立伯父、仲子，還有比、要、荒服諸侯。以上是第三層內臺。下降到第二層中臺，左泰士，右彌士，各有四人接受賓客之贄。再降至第一層的外臺，陳列幣帛，縛璧的蒼帛、虎豹皮和黑組紐，四隅搭帳篷以供休憩。外臺之外的平地則按東西南北排列四方遠來朝會的蠻夷戎狄，他們隨身攜帶寶貴的贄物（圖八）。



圖八：王會圖（作者繪製）

四裔酋長排列在外臺周圍，東邊自北而南列稷慎等 20 國，面朝西；西邊亦自北而南列義渠等 20 國，面朝東；北邊東部高夷等 7 國，西部般吾等亦 7 國，共 14 國，皆面朝南；南邊東半權扶等 5 國，西半魚復等 3 國，共 8 國，皆面朝北，共同圍繞高臺。這個朝會場景反映奉周王為共主的天下秩序，十足具象的模組，堂上內廷是權力中心，內臺是華夏諸邦，即「中國」，外臺之外是蠻夷戎狄四裔。文本顯然有脫簡，南邊殘脫尤甚。⁶⁵

四裔酋長攜帶的贄物多是奇禽異獸或山珍海味，皆該國所寶之特產，琳瑯滿目，有如三千年前在洛陽舉辦的世界博覽會。這些異物尚不至於如《山海經》，尤其《海外經》或《大荒經》的怪誕，大體上還可以理解，只因「中國」所未有，或罕有，少見多怪故記述遂多少帶點神秘意味。下文所述多參考清人朱右曾的注解。⁶⁶

東邊北起稷慎（肅慎）、穢人，往南經東越、於越、具區至會稽，大概從中國東北沿海而南至浙東。這一路東夷國家的特別禮物，稷慎的大麀（疑即麋鹿），發人的

⁶⁵ 四邊夷狄簡，東邊開頭「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龍（鬘），謂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此格式，其他三邊皆缺。又某酋長帶某贄，都有「以」字，如「義渠以茲白」，「央林以首耳」，但多數漏掉。東西兩邊皆各有 20 國，北邊只有 14 國，南邊 8 國，南北兩邊應該有遺漏。

⁶⁶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以下簡稱《集訓》。

麋（自注：若鹿迅走）、黑齒的白鹿白馬，以及周頭的輝羝（自注：羊也），解的隃冠，或即羴，如驢，歧蹄。⁶⁷ 以上都是近似馬、鹿、羊之類的野獸，中原少見。揚州的禺（自注：魚名）、東越的海蜃（蛤），歐人的蟬蛇（鰻類也），於越的納（鱸），姑妹的珍，具區的文蜃，共人的玄貝，海陽的大蟹，會稽的羆（鼉，鱷也）等水產，生活在黃土地者不可能有的經驗，但濱海之人不以為異。自深國的桂，朱右曾《集訓》引《埤雅》云，桂有三，曰菌桂、牡桂、桂，皆生南海山谷間。這是東夷諸國所寶唯一的植物，已偏南方，故孔晁注曰：「自深，南蠻也。」

東夷其他算上奇怪之物者，有兪人的雖馬，孔晁云：即羴，如馬一角，或似英文的 unicorn，和青丘的九尾狐一樣，屬於神話動物。穢人的前兒，自注：「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朱右曾《集訓》引《爾雅注》以為是鮑魚。良夷的在子，自注：「在子，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蠶則鳴曰在子。」幣，朱右曾《集訓》疑即鼈。白民的乘黃，自注：「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山海經·海外西經》同，並云：「乘之，壽二千歲。」這些的確是人間罕見之物。

高臺西邊站立的酋長，北自義渠、央林而南，經樓煩、氐羌、巴、蜀至都郭、奇幹。義渠、樓煩，史書多有記載，起自今寧夏靈武、固原及晉北，南下經青藏高原東沿和四川，最南的都郭、奇幹不可考，可能當今貴州、雲南地帶。這條西線的戎狄所貢贄物多猛獸和異禽，義渠的茲白，「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央林的酋耳，「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渠叟的鮑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以上自注）和這三種猛獸相比，虎豹反而成為溫馴的動物了。北唐的閭，「似隃冠」，如驢（上文已見）；樓煩的星施，自注：「珥旄」，朱右曾《集訓》云即旄牛；卜盧的絜牛，自注：「牛之小者也。」這兩種動物為經驗世界所有，奇與不奇在於識或不識而已。但區陽的鼈封，自注云：「若彘，前後有首」，雙頭野豬；規規的麟，自注云：「仁獸也。」麟，孔子雖然知見，給牠定名而且寫入《春秋》，但到底是什麼樣的動物，始終沒明說，至於如後世所傳的似鹿、牛尾、一角、馬蹄者，（孔晁注）已經神話化。異禽則有西申的鳳鳥，自注：「戴仁、抱義、掖信」；氐羌的鸞鳥，與鳳相類，方煬的皇鳥，鳳雌而凰雄，凡此皆如麒麟，後世神話化，原來長成什麼樣貌典籍無傳。牠們大概和蜀人的文翰、方人的孔鳥（孔雀）一樣，屬於艷麗的美禽，文翰是有文采之鳥，自注：「若皋雞」；另外巴人的比翼鳥，舊注云，似鳧，青赤色。這些美禽都出於今四川。最南端的奇幹出善芳，自注：「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善芳的羽毛具有辟邪作用，佩戴之便不會被鬼物迷惑。西邊外族之禮物，還有卜人的丹沙，夷的闌木，康民的桴苡。闌木可能是烏文木，其堅若鐵；桴苡，自注「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和丹沙一樣，皆具實用性。州靡的費費，後世寫作狒狒；都郭的生生，亦作「狌狌」，即猩猩。自注云，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弇其目，食人，北方

⁶⁷ 隃冠，〈王會〉下文曰：「閭似隃冠」，閭見於《山海經·北山經》郭璞注：「閭即羴也，似驢而歧（歧）蹄，角如麋（羴）羊，一名山驢。」

謂之土螻」；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狒狒和猩猩都好理解，中原未見，故在〈王會〉作者筆下成爲怪物，對於其他不可解的動物可能都如此造成的。至於都郭之贄欺羽，則可能是鷗類。

高臺北邊分東西兩半，各有七國，酋長立位自東而西，與該國實際地理方位相同。東起高夷，即高驪，西止於山戎，中經獨（涿）鹿、孤竹、不令支（「不」發語詞，即令支）、東胡，皆史籍通見之戎狄。高夷的嗛羊，「羊而四角」；獨鹿的邛邛，「善走者」，（自注）孤竹的距虛，孔晁云野獸，驢騾之屬；不令支的玄獫，似熊，小頭，庫腳，（《爾雅》注）東胡的黃羆，亦熊類。只有山戎帶來名曰戎菽的巨豆做見面禮，是植物，其他皆是北方動物。繼續往西的禹氏、大夏、犬戎、匈奴，亦史籍常見的國家。般吾的白虎黑文與屠州的黑豹顯係猛獸，匈奴的狡犬，「巨身、四足果（倮）」，是四足無毛的巨犬，應該相當凶猛。禹氏的駒駘，似馬而青色，《史記》說是匈奴的奇畜；（〈匈奴列傳〉）犬戎的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自注）這兩種皆屬於馬類。大夏的茲白牛，「野獸也，牛形而象齒」，似異獸；數楚的每牛，「牛之小者」，（自注）如果釋作《山海經·西山經》的犛，「如牛而蒼黑，犬目」，並不稀奇。

正南的蠻族，其中長沙、魚復、揚蠻、倉吾（蒼梧）地望可推。從東到西，權扶的玉目乃光亮的小玉，白州的比閭，自注：「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終行不敗」，當係一種堅木。禽人的菅，路人的大竹，和長沙的鼈，皆實用植物與水產，魚復的鼓鐘，自注：「鐘牛」，或係一種牛，⁶⁸揚蠻的翟（山雉），倉吾的翡翠，自注：「翡翠者所以取羽」，和翟一樣羽毛鮮艷。

傳統說法把〈王會篇〉歸於周武王，唯開篇說「成周之會」，武王不及營建成周，應該歸於成王。然而《尚書》可信的周初文誥雖有〈多方篇〉，告「四國多方」，完全看不到〈王會〉絲毫蹤影。事實上要東西南北遙遠地方的人同一時間在一個地點集會，即使今日訊息與交通之便利也相當困難，何況是三千年前的條件，〈王會〉不過是後人的想像寄託而已。劉知幾注意到「〈職方〉（即〈王會〉）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而論斷爲「百王之正書」，⁶⁹也就是西周的正典，反而透露應該是戰國時代的著述。

誠如上文所論，戰國時代「中國」意識已經形成，強國如魏、齊、秦多想稱王，而楚之稱王早已有之；當時社會也有「定於一」的呼聲，遠方四裔來賓成爲理想君王的必要門面之一，於是把當時的地理與民族知識，以《山海經》的風格鋪陳出這個壯闊的場面。《周禮》的建國藍圖，〈職方氏〉只講述天下九服的政治架構，〈大行人〉才規範屬於「內」的「中國」，其六服所該負擔的貢品，但對於「外」的夷狄三服無貢，

⁶⁸ 〈王會〉作「魚復鼓鐘，鐘牛。」當讀作「魚腹以鼓鐘」，疑下文「鐘牛」是自注；但孔晁注云：「鼓及鐘而似牛形者」，太曲折；朱右曾引王念孫《讀書雜誌》曰「鐘牛未詳。」

⁶⁹ 參張心激，《偽書通考》（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頁504。

只說：「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贄）」而已，〈王會篇〉可以作為四裔貴寶之贄的注解。荀卿理想的天下秩序，列舉四裔來貢的特產，北方是走馬吠犬，南方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矸），東方有紫紘（蛙）、魚鹽，西方是皮革、文旄。（《荀子·王制篇》）楊倞注：曾青，銅之精可續畫及化黃金；丹矸是丹砂，紫紘即紫貝。^⑩荀子規劃的四裔，貢獻的禮物都不如〈王會篇〉的奇異，也許他只是概略言之而已。

〈王會〉的贄物，即《周禮·懷方氏》遠方之民所致之方貢、遠物，用「贄」字原來還有一點視遠人如賓客的意味，但在「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萬章上》）的世界觀裡，即使不在統治範圍內，也把遠客帶來的禮品等同九州的「貢」。在傳統中國觀念中，外國人怎能獲得平等的對待？及至秦漢帝國取代周的五服秩序，蠻夷擴大為周邊國家，對於當時的遠方國家又如何看待的呢？

史載東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國王安敦遣使奉獻象牙、犀角、瑇瑁，（《後漢書》〈桓帝紀〉、〈西域傳〉）來自羅馬，是真正的遠國了。既是使節，當有國書，〈西域傳〉謂之「表貢」。這位安敦王即羅馬皇帝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0-180），西元一六一年至一八〇年在位，羅馬帝國五位賢君之一，也是「羅馬盛世」（Pax Romana）的最後一位皇帝，斯多葛（Stoic）學派哲學家，簡樸自律，有希臘文名著《沉思錄》（*Meditations*）傳世。這樣的帝國能看作蠻夷嗎？國書如何自稱，又怎樣稱呼漢皇帝？史料不傳，無從論斷。范曄以「並無珍異」而「疑傳者過焉」，單憑禮物規格不夠高，沒有稀奇的珍品，就懷疑所謂使臣是商賈假冒的，恐怕缺乏說服力。

隋朝難得留下國書的資訊，雖然簡略片斷，當是原文，故彌足珍貴。《隋書·東夷列傳·倭國》記載：「大業三年（607）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天既然無二日，民怎能容有日出和日沒兩處天子，隋煬帝自然「覽之不悅」，命令掌管四夷朝貢、宴勞、給賜等事務的鴻臚卿，以後「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倭的國書應該寫漢文，史官雖然只記錄一句話，卻保存對等稱謂的兩「天子」與平等的用語「致書」，打破中國人自古以來的世界想像。難怪楊廣看了很不高興，並且交代這類夷書不知禮制，不要再上呈。

後世國書除朝鮮、琉球的以外，大概都要經過中國外交官翻譯、修飾才呈給皇帝閱覽，稱謂自然變成有上下之分，遣詞用字也恭謹地採尊卑之別，所以早期文獻的「贄」字便不再用，於是或「朝」或「貢」，史不絕書，這就是日本東洋史學者所謂「朝貢體制」的真相。不限於文書用語的禮儀，中國這套天下秩序還有更深層意義值得探討。

〈王會〉、〈職方〉是否如孔子理想的天下秩序，修文德以來遠人？我們不知這篇作者的用意。無論如何，當中國本部奠立、以皇帝為中心的集權政體出現後，〈王會篇〉所述四裔的朝貢遂成為歷代帝王追求的目標，既彰顯國威，又可宣揚遠人來服的聖王

^⑩ 參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62），頁103。

形象。但從漢武帝、王莽以下，外國人進行所謂的「朝貢」，多是中國派遣使臣利誘來的，史書美稱「招諭」，招諭不到則出動大軍征伐，隋煬帝打流求國，元世祖對日本多是這個路數，致使元遠征軍遭風暴盡沒。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招諭就是明成祖遣鄭和下西洋，當時的語言叫做「開讀賞賜」，用中國特產（如絲綢）換取當地國進獻方物，「朝貢」真象如此，於是乎構成「四方來朝」的盛世榮景。^①若把這些個別景象匯聚在一起，訴諸丹青具象化，就出現歷朝的「王會圖」或「職貢圖」。

職貢圖的繪製推始於何時？舊說始自西元六世紀前半的梁元帝蕭繹，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五代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乾隆為此圖題識，頗多質疑。^②他說：「元帝於侯景亂後，已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嶺南為蕭勃所據，詔令所行不過千里，民戶著籍不盈三萬，豈尚有番夷朝貢之事？」從常情推斷，這麼疲弱的國家的確難有四方 33 個國家（2 國遺漏題榜）遠來朝貢，何況蕭繹在位又只有短短不及兩年。然而乾隆既疏於考察，話說得太快太滿。

其實蕭繹之繪製職貢圖是在他鎮守荊州時，他的〈職貢圖序〉說得很清楚，「臣以不佞，推轂上游」，梁都建康（今南京）的上游即指荊州。亞洲內陸國家的使節或商旅要到南京，多取道於此，正如序文說的，「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闕蹶角，沿泝荊門。」對於這些外國使臣，他「瞻其容貌，訊其風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這卷職貢圖完成於「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即梁武帝大同七年（541）。^③而據《梁書》卷五四的外邦列傳，梁武帝時，外國使節也確實很活絡。所以題為《梁元帝蕃客入朝圖》的職貢圖是蕭繹贊頌其父梁武帝蕭衍的畫作，不是說他自己。

此圖題榜的國名多見於《梁書》〈武帝本紀〉與〈諸夷列傳〉，詳記各國遣使貢獻方物的年月或日。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唐朝史官稱贊他的統治，「征賦所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七千。其中環財重寶，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闕庭三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考《梁書》本紀〈武帝中〉朝貢始自天監二年（503）七月「扶南、龜茲、中天竺國各遣使獻方物」，至中大同元年（546）八月渴槃陁國遣使為止，長達四十三年之久，共 60 個國次。^④第六世紀上半，國際外交活動這麼頻繁，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吧，這是職貢圖製作的政治社會背景。

① 參看《漢書·地理志下》、《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明史·外國三》日本、馬歡《瀛涯勝覽·序》。

② 劉芳如、鄭淑方主編，《四方來朝——職貢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圖版 No. 4。

③ 梁元帝，〈職貢圖序〉，收入《輯佚類地理文獻集成（四）》（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頁 720-721。年代考訂見陳連慶，〈輯本梁元帝《職貢圖》序〉，《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7.3：1-4。

④ 梁武帝朝來獻外邦：

西元	國名
503	扶南、龜茲、中天竺
504	北天竺
506	鄧至
510	林邑
511	宕昌
512	宕昌

蕭繹之後，唐閻立本繼之，以後歷朝歷代都不乏這類畫作，到清乾隆朝題為「臣謝遂恭畫」的《職貢圖》，共四卷，達到極致，臺北故宮多有典藏。就表現形式論，可以分作兩類，一是貢使攜帶禮物，如閻立本《職貢圖》、李公麟《萬國職貢圖》、蘇漢臣畫、趙孟頫畫的《萬國朝宗圖》等；另一類只畫各國人物，如閻立本《王會圖》、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蕃客入朝圖》以及謝遂《職貢圖》。這兩類往往都有榜題或簡要題識，以增廣閱覽者對該國或該民族的見聞。傳世職貢圖數量頗豐，內容龐雜，又存在著畫作真偽等問題。單以內容論，其所表現中國人對異族或異邦的認識就有許多考證需要鑽研，而想像與實際的錯雜亦反映當代的政治經濟情況。

羅馬史家佛羅魯斯（Lucius Annaeus Florus, 74-130）的《羅馬史綱》（*Epitome of Roman History*）最後一章述奧古斯都封神的盛世（deification of Augustus）說，西方與南方所有民族皆臣服，北方萊茵與多瑙兩河之間，東方從庫拉河（Cyrus）到幼發拉底河（Euphrates）的國家也都在帝國控制之下。草原斯基泰人（Scythians）和撒兒馬梯人（Sarmatians）遣使尋求友誼，住在太陽直射之下的賽里斯人（Seres，即 Chinese）和印度人趕著大象，攜帶寶石真珍，經過四年的時間長途跋涉前來進貢大禮，¹⁵在中國畫家筆下，這也是十足的職貢圖。

大凡廣土眾民的帝國都有遠人來服的虛榮心態吧，但像梁朝只剩下半壁江山，而趙宋與遼、金、西夏、蒙古並列，卻也都在紙面上過天下一統的癮，追根究柢，恐怕

514	扶南、于闐
515	狼牙脩
516	高麗、芮芮、河南
517	河南、扶南、婆利
519	于闐、扶南
520	扶南、高麗、滑國、河南
521	百濟、新羅
522	婆利、白題
523	狼牙脩
526	滑國、河南、林邑
527	林邑、師子、高麗
528	芮芮
529	芮芮、盤盤
530	林邑、扶南
531	狼牙脩
532	盤盤、高麗
533	河南、波斯
534	林邑
535	高麗、丹丹、波斯、扶南
538	河南、芮芮
539	扶南
540	河南、盤盤
541	宕昌、高麗、百濟、滑國、芮芮
546	渴槃陀

¹⁵ Lucius Annaeus Florus, *Epitome of Roman History*, trans. Edward Seymour Forster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9), Book II, pp. 349-351.

還是和長久的天下觀的傳統息息相關吧。所以明明外邦人是來做生意，也非借朝貢之名不可。

職貢圖既然建立在外族異邦來「朝」，來「貢」，來服「職」事的前提下，基本出發點自然是對我朝今上的歌功頌德，外邦職貢只不過是一種媒介而已。明成祖永樂十年（1413）使少監楊敕（敏？）等往榜葛刺（今孟加拉國與印度西孟加拉邦），¹⁶翌年該國遣使奉表，進獻長頸鹿。這是中國人素所未見之獸，卻又以未曾見過的傳說動物「麒麟」名之（圖九）。

按南宋趙汝适《諸蕃志》弼琶囉國條曰：「獸名徂蠡，狀如駱駝而大如牛，色黃，前腳高五尺，後低三尺，頭高向上，皮厚一寸」，即是長頸鹿（giraffe）。馮承鈞校注云，弼琶囉乃 Berbera 之對音，今非洲 Somali 沿岸之地。又云，giraffe，波斯語名 zurnapa，阿刺壁語名 zarafa，故「徂蠡」蓋 Somali 語 giri 之對音，也是今日英、法語之所本。¹⁷趙汝适的資訊是他提舉福建路市舶司時詢諸胡賈而得，遂以譯音名之。明代永樂年間隨鄭和下西洋的費信，所述《星槎勝覽》天方國條記其動物有獅子、駱駝、祖刺法、豹、麀和高八尺的天馬，他沒到過天方，所以「祖刺法」之名也是得自胡商，不會有麒麟的附會。

麒麟長成什麼樣子，中國典籍不可考。魯哀公十四年（481 BC）《春秋經》曰：「西狩獲麟。」據《左傳》原來是叔孫武叔的駕車子（御者）鉏商獵獲一頭野獸，從未見過，以為不祥，叔孫賜給林圉管理員（虞人）。但高齡已過七十的孔子一聽是不知其名的異獸，趕去觀看，就說：「麟也」，但其形狀《左傳》仍然沒記錄下來。至於上文提到孔晁注《逸周書》〈王會篇〉的麟，鹿身牛尾而一角，以及如《三才圖會》所畫的龍首鹿身馬蹄牛尾，都是自然界不存在的神話動物，但很早就被賦予「仁獸」的美譽，《說文解字》就這樣定性了。



圖九：明人畫麒麟沈度頌
（《四方來朝——職貢圖特展》）

¹⁶ 費信《星槎勝覽》前集目錄，參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臺北：商務印書館，1962）。

¹⁷ 馮承鈞，《諸蕃志校注》（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頁 57-58。

如此異獸，不遠千里來貢，永樂帝乃命宮廷畫工寫其形，翰林院修撰沈度題〈瑞應麒麟頌〉。⁷⁶頌序直接點出祥瑞異物的由來乃皇帝「德化流行，協和萬邦，三光順序，百靈効職」之故。「協和萬邦」是《尚書·堯典》恭維聖王堯帝偉業的話，今「皇帝陛下與天同德，恩澤廣被，……和氣融結，降生麒麟，以為國家萬萬年太平之徵。」榜葛刺致贈的長頸鹿不過使明廷臣工歌頌皇帝有個藉口罷了，他們並不考辨名物，也不問榜葛刺如何會有這種動物的地理學、博物學問題，唯一口咬定今上「致治法古，萬方底定，……和氣薰蒸，溢于寰宇」，永樂帝的聖德甚至使遠在大明「西南之陬，大海之澗」的國家，「寔生麒麟」。麒麟「大瑞茲至」，直如「岐鳳鳴周，洛龜呈禹」，在沈度這種部屬的口中，這個滅姪奪位的永樂帝簡直德比周文，功邁夏禹了。

職貢圖作為皇上德澤、天下太平的表徵，其民族之複雜，國度之遙遠，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宮廷畫家謝遂完成的四卷《職貢圖》達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境地。⁷⁷早在十年之前，乾隆帝曾令大學士傅恆傳達諭旨：「著沿邊各省督撫於所屬苗獠黎獐以及外夷番衆，仿其服飾，繪圖送軍機處，彙齊呈覽，以昭王會之盛。」⁸⁰他要做周武王，複製周朝盛世。第一卷畫外國，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和西歐、俄羅斯，還有地位特殊的西藏、蒙古、新疆；第二卷畫滿洲、福建、臺灣、湖南、兩廣；第三卷，甘肅與四川，明清稱作「西番」者；第四卷雲貴等地的少數民族。大體而言，職貢圖不包含中國本部內直接統治的編戶齊民，只圖繪傳統的勢力範圍，而外邦即使帝力不及，但既在四裔之列，當然也要奉戴普天之下的唯一皇帝，至少中國帝王都存這種想法的。

乾隆《職貢圖》，每圖都繪盛裝男女各一人，不論形貌或服飾多介於真實和想像之間，倒是題榜的文字說明，可以當作一篇簡要民族誌看。後三卷涉及的地域多已隸屬清之版圖，第一卷的蒙藏和新疆在清廷牢牢控制之下，一般認為屬於清，然而在《職貢圖》的脈絡裡猶與完全獨立的外國併列，推其原因或許要呈現華夷皆臣服的帝國意象吧。所以在圖作完成以後，新有歸附者，乾隆帝立刻命令增繪，補入全卷之中，如第一卷的愛烏罕，土爾扈特臺吉和整欠、景海。御題云，「愛烏罕、霍罕距拔達克山尚三月餘程，重四譯始達。」土爾扈特臺吉因「棄其舊居俄羅斯之額濟勒游牧，率屬歸順」；整欠、景海在雲南邊外，「地在僻遠」，他們分別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間（西元 1763、1771 和 1769 年）歸附，遂命增入圖繪，「以誌遠服，昭來許」。⁸¹民族類別愈多，路途愈遙遠，「普天之下」的意識愈能落實，難怪日理萬機的乾隆毫不遺漏地要求補全，並且親自題識。

乾隆皇帝為四卷《職貢圖》分別題引首，第一卷是「蘿圖式廓」，謂列入版圖規模之大，其次依序是「卉服咸賓」云島夷來朝，「琛賚雲從」乃相繼進貢寶物，「梯航星

⁷⁶ 劉芳如、鄭淑方編，《四方來朝——職貢圖特展》，圖版 No. 15；釋文頁 252。

⁷⁷ 劉芳如、鄭淑方編，《四方來朝——職貢圖特展》，參圖版 Nos. 16, 17, 18, 19；釋文頁 253-279。

⁸⁰ 傅恆等編著，《皇清職貢圖》（瀋陽：遼瀋書社，1991），頁 1。

⁸¹ 劉芳如、鄭淑方編，《四方來朝——職貢圖特展》，圖版 No. 16，幅第 60, 65, 68；釋文頁 258。

集」謂遠渡重洋而來。這些冠冕堂皇的話和繪畫內容與事實並不相應，譬如歐洲、東北亞、東南亞怎麼會是版圖，不過十足反映他的心態罷了。他並且以詩作抒發其不可一世的豪情。詩云：

累洽重熙四海春，皇清職貢萬方均；
書文車軌誰能外，方趾圓顛莫不親。

古來的語彙「四方」已不能滿足，改稱「萬方」，天下在他的統御之下，凡作為人者無不沾其恩澤。

那許防風仍後至，早聞千呂已成賓，
塗山玉帛千秋述，商室共球百祿臻。

他的道德與功業遠遠超過夏禹和商湯。

西鑠東鵜覲王會，南蠻北狄秉元辰，

蠻夷戎狄四裔來朝就如西周成周之會。他又令親近大臣和詩，共有十四人，基本上多是同樣的歌頌曲調，使用的文句相差無幾，不外是「遠來近悅」，（梁詩正）「通重譯」，「備九寶」，（劉綸恭）或「永藏冊府超前古」，（董邦達）或「八表車書同暨訖，萬方玉帛共尊親」。（裘曰修）而于敏中恭維乾隆「唐虞以上初無紀，秦漢而還未克臻；地或不毛咸我土，類雖非種亦吾人」，臣工把乾隆捧上天，五千年帝王中，無人能及矣！^{③2}

歷代職貢圖有一種貢獒的題材，臺北故宮藏宋朝艾宣的《西旅貢獒》、據傳錢選的《西旅貢獒圖》，及傳趙孟頫的《貢獒圖》和元人畫的《貢獒圖》，^{③3}雖同是遠方異物，但意涵稍有不同。這個題材出自偽《古文尚書》〈旅獒〉，傳說周初三大元老之一的太保召公所作。周人克商之後，「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之長貢其特產的獒犬，召公作以訓誡成王，主旨不外德重於物，天子「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來也）」，其中還有「玩物喪志」一語成為後世訓誡人的話。我們雖然不敢相信果有獻獒之事，但偽《古文尚書》被當作經典看待，遂多有《貢獒圖》之作，大概代表如祭公謀父「耀德不觀兵」的思想吧。

即使晚到十八世紀下半葉，中國人已有許多機會增廣異域見聞了，但腦子裡還是三千年前的五服制、王會圖，對來到眼前的異邦外族始終缺乏深入、客觀了解的興趣，因為他們只有以帝王作中心、高高在上的天下觀，沒有平起平坐的世界觀。換言之，「四裔觀」限制了「列國觀」，這種心態在官修正史表露無遺。

^{③2} 全部詩作參上引傅恒等編著，《皇清職貢圖》，頁 2-22。

^{③3} 上引劉芳如、鄭淑方編，《四方來朝——職貢圖特展》，圖版 Nos. 7, 9, 10, 12。

中國正史纂修體例，對於外國，西漢司馬遷《史記》從其本名，如匈奴、南越、東越、朝鮮、大宛，只西南部落酋邦稱「西南夷」；東漢班固《漢書》從之，晉朝陳壽的《三國志》，烏桓、鮮卑從其名，但朝鮮半島及鄰近的國家則統括於「東夷」。南朝范曄的《後漢書》，東夷、南蠻、西南夷外，西方的羌和西域、北方的南匈奴、烏桓、鮮卑猶存其名，這是二十五史前四史的史識。

南朝四史，梁時編修的《宋書》，西方曰「索虜」，南、東曰「蠻夷」，另外鮮卑、吐谷渾、氐胡比較沒有明顯的貶抑意味；同時的《南齊書》亦謂「魏虜」與蠻夷。隋唐之際的《梁書》稱夷、戎，《陳書》無傳。唐初李延壽纂修《北史》與《南史》，前者對四方外國都從其名，後者除「西域」和「南海諸國」外，都採用「東夷」、「西戎」、「北狄」之稱；因為《北史》非漢異族是主角，《南史》則是中國人的天下，才有這樣的差別。

唐修《隋書》，西域之外的外國分別列入東夷、南蠻、北狄；《晉書》有〈四夷列傳〉，但進入中國建立政權者的外族則別創「載記」。五代《舊唐書》、北宋《新唐書》，大國如突厥、吐蕃、回紇（鶻）、沙陀用本名，西域諸國仍稱西域，而非「西戎」，其他便分屬東夷、北狄和南蠻。北宋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列有「外國」，皆有其本名，中國正史之有「外國列傳」自此始，可能因為後唐開國之君李克用與後漢劉知遠都是沙陁人之故，既寫他們的歷史，自然不能再稱他們戎狄。但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則立「四夷附錄」，不入列傳，亦反映這位大文豪的心態。

可見先秦時期帶有野蠻意味的「四裔」稱呼，漢代兩位大史家尚未沾染鄙薄異族外國的惡習。唐宋官修史書之民族意識與價值評斷便表現得非常明顯。元修宋、遼、金三史，繼《舊五代史》之後，也出現「外國」的概念，此一變化，當是蒙古政權之故，但西南部落仍稱「蠻夷」。明修《元史》又都改回「外夷」，清修《明史》則恢復「外國」，凡此都和皇帝的族屬息息相關。漢人當家，要求平等對待異民族，甚難！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的實力當不起天下中心了，不得不從「王會」的高臺頂上走下來，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加給億萬中國人無限的悲憤和感慨。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富強了，他們相信「東升西降」，中國人要遠邁漢唐，於是有稱霸全球的「一帶一路」佈局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號召。現在中國以此面對世界的態度，大家有沒有嗅聞到「五服」、「王會」和「職貢」的氣息？而這些思想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

歷史一路發展下來，我們深刻地體會到：古典是基因，傳統只是現象。幾千年前的人事話語，直到今天，好像還可以看到一些影子，都構成「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元素。